






知識流轉

臺灣
地方志書寫

與

方豪治學理念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特藏管理組——編



序

方志作為中國傳統歷史書寫的形式，源遠流長。方志至少包含了帝制中國對天地人的認識、官方對治下人民的期待、地方士人對本地文教的彰顯，以及帝國物產人事萬物的紀錄與展現。一個地方足以修纂方志，顯示該地不僅納入版圖，同時文教已興，已有足夠多「文明」的事蹟得以或必須記載。因此在傳統的框架下，方志都隱含了高度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然而受到近代歷史學與政治體制改變的衝擊，方志的意義有了巨大轉變。當帝國成為民國，方志原先以皇權為中心的宇宙觀被迫改變，原先推動地方志的重要群體士人階層，也失去了制度保障的身分。然而，基於保存鄉土歷史、發揚鄉賢事蹟、抑或突顯地方特色等理由，方志在現代也找到新意義，其內容架構與書寫方法具有濃厚的現代學科色彩，目的與內容除了國家視野之外，也注意各種日常生活與庶民樣態，並成為保留地方文獻、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的重要工程之一。其斷裂與傳承、質變與新生，成為極具特色的地方知識累積方式。

曾在政大任教、也與政大淵源極深的方豪教授，一生治學廣泛，其中也包含方志。方豪教授有關在方志學的詳盡貢獻，可見後述盧胡彬教授的介紹，然而他在方志資料蒐集、考證、辨誤、編輯、編印與纂修工作，讓他累積大量的藏書，這也是政大所收藏孝思堂文庫的重要部分。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多年持續蒐集各式一手史料，充實特藏資料，並挑選主題逐步數位化。本年即以孝思堂藏書為主題，進行數位加值工作，建構資料庫，並藉公布機會，在2022年11月11日召開第十屆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設定主題為「地方志書寫與知識流轉：臺灣史學的建構與發展」。

本屆論壇共邀集三位老師進行主題演講，兩位年輕學者發表論文，並進行兩個場次的方豪孝思堂文庫特展導覽，結合資料庫，展現虛實整合的特性。為配合主題，大會先請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洪健榮教授，主講「地方學與臺灣史研究」，細數地方學在戰後臺灣的發展歷程、地方學對臺灣史研究的回饋、在地連結與學術傳統的建立，並以新北學為例，說明臺灣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地方學知識傳統如何建構與發展。其次邀請多年來鑽研文山地區研究的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詹瑋退休副教授，講述「我的文山地區地方史修志經驗」，以他豐富修志經歷，說明一部方志從籌組團隊、田野調查、行政協調、撰寫分配，以及取得在地人士信任的各種細節。詹老師從《深坑鄉志》出發，陸續參與及編纂《文山區志》與《深坑鄉志續編》，其經歷也提供大學歷史系與地方志編纂、以及學校單位籌組團隊兩種運作模式，不僅有助實務的推進研討，也成為臺灣1990年代之後地方修志風潮的重要見證。

本次論壇第三場專題演講，邀請到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盧胡彬教授，主講「方豪的臺灣地方志研究成果與影響」。盧教授細數方豪投身臺灣地方志研究的歷程，將之分為四階段，分別為草創時期（1949-1951）、轉型時期（1952-1965）、反省時期（1966-1974）、成熟時期（1978），並說明其影響為蒐求輯印臺灣舊方志、闡述清代臺灣方志的發展歷史、整理和利用地方志書，以及提倡修志人才為重並身體力行。盧教授同時指出，方豪教授早年特別注意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記載，同時也重視浙江文人與臺灣修史之間的關係。盧教授的演講讓聽者在短時間內全盤掌握方豪教授在臺灣地方志的工作，也更能理解他所開創的問題在戰後的臺灣史研究中所具有的價值。

兩位年輕研究者也映照本次論壇主題，分別論述地方志書與方豪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朱書漢，以〈臺中市地區有關歷史書籍、地方志書發展探討（1896-1934）〉為題，著重日治時期臺中市相關的歷史與方志發展歷程。朱書漢指出原先相關的書籍是以觀光推廣為目的，因此多有交通與旅遊資料，但後來地方沿革與名勝古蹟介紹的內容漸增，甚至也出現各類主題的統計書籍。最後，綜合性的《臺中市史》出現，成為當時臺中市地方志書的集大成者。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徐維里，發表〈「國世」與興趣：方豪的臺灣史研究〉，指出方豪主張中國作為「祖國」的角色，建立臺灣與中國的連結，以及彰顯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但也強調臺灣本省人寫本省史的重要性。而他重視臺灣方志文獻的編集、校勘、審定以及出版，也有不願讓日本人專美於前的民族意識。換言之，藉由方志與歷史教育，重塑國家的身世（國世），是其投入臺灣方志研究的重要動力，而方豪在史料、研究議題與史學大眾化的理論與實踐，拓展了臺灣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於今看來更顯先鋒與遠見。

方豪教授在臺灣地方志書的研究，以及諸位先生及年輕研究者的闡述，正足以昭示對一個地方的認識，需要一代又一代從基礎工作出發，累積資料與開創議題。地方志書作為一種特殊的書寫形式，承載了官方與民間對地方認識的需求，而此需求並不會隨著時代而消失，志書反而因此推陳出新。藉由此次論壇，對於地方志書與方豪教授的貢獻，得以進一步認識，也期待引發興趣，前往政大圖書館利用孝思堂文庫與方豪先生史料資料庫。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林果顯 謹識

館長序

臺灣史在早年被視為中國史學中之地方、鄉土、方志的旁支，近年來逐漸發展成為具主體性的獨立研究領域。本館特藏中心館藏「方豪孝思堂文庫」的捐贈者方豪教授，身兼天主教神職及歷史學者，二戰前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與天主教史聞名，來臺後發揮近身之學的精神，投入臺灣史研究，傾力訪求、蒐集與校勘臺灣方志史料。其作為長期關注地方志研究之學者，將研究視野關照到臺灣地方志，對於臺灣史研究的早期發展做出奠基的貢獻。

2022年11月11日由圖書館及臺灣史研究所合作舉辦的第十屆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以「方豪孝思堂文庫」為主題發想，邀請本校臺灣史研究所林果顯副教授兼所長擔任召集人，並以「地方志書寫與知識流轉：臺灣史學的建構與發展」為論壇主題進行探討。本次論壇「專題演講」特別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洪健榮以「地方學專題演講：地方學與臺灣史研究」為題，論述地方學的發展、形成過程與臺灣史研究之關聯，並以「新北學」為例闡述其論點；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退休副教授詹瑋以「地方志纂修實務專題演講：我的文山地區地方史修志經驗」為題，詳細回顧其實際參與《深坑鄉志》、《臺北市文山區志》以及《深坑鄉志續編》的編纂工作及過程，並分享其修志的實務經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盧胡彬以「方豪學思歷程專題演講：方豪的臺灣地方志研究成果與影響」為題，論述方豪先生蒐集臺灣各地地方志，並據此進行史料分析研究，讓臺灣史從中國史的分支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專門學科。此外，本次論壇特別邀請臺史所林果顯所長主持「論文發表」，由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朱書漢發表〈臺中市地區有關歷史書籍、地方志書發展探討（1896-1934）〉，以及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徐維里發表〈「國世」與興趣：方豪的臺灣史研究〉，透過研究者的論文，使我們對臺灣的地方志書寫與方豪先生的治學有更深層的認識。

《知識流轉：臺灣地方志書寫與方豪治學理念》一書，收錄2022年於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的專題演講與論文。此書同時是政治大學數位史料研究叢刊的第十本專書，延續圖書館在推動數位史料應用與學術研究工作上的努力。本書收錄的專題演講經講者確認其文稿，研究論文均依循主持評論者意見修正，讓此專書更臻完整。承蒙林果顯所長在論壇的籌備與本書出版的指導與支持，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忱。

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序文定

2023年9月於政大

地方學與臺灣史研究

洪健榮*

廖館長、詹老師、在座的所有老師、還有關心我們地方文史的社大老師及夥伴們，大家早！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到達賢圖書館，分享我這幾年來有關地方學還有臺灣史研究的一些心得。今天進入達賢圖書館，第一眼看到方豪先生紀念圖書的展示，很快地就聯想到1994年我還在清華大學讀歷史研究所碩一的時候，從臺北縣泰山鄉騎著摩托車來到了政大，那時候是社資中心，因為我的指導教授要我幫他找方豪特藏室裡面的一份天主教文獻，那時候我也趁這個機會從頭到尾花很多時間去瀏覽有關方豪的一些相關典藏。方豪先生著作很深廣，其中有一篇文章〈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我就在碩一的時候，因為搭配了一些相關的文化交流史研究，然後好好地閱讀之後，當時很難想像那篇文章影響到我後來相當多的研究，有關方志學、中西交流史，特別是西學與傳統中國知識的一些想法，我也以此主題完成我的碩士論文，甚至到了博士班的時候，也以相關的主題去探索「臺灣方志中的西學」這樣的課題。延續此課題，後續也曾針對方豪先生本身對於臺灣史研究的一些相關理念及影響進行評述。所以，「方豪先生近身之學的實踐」這句話，到哪個地方就從事哪個地方的研究，也許也帶出了我今天所要探討的主題，就是「地方學」，近身之學的一種實踐。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可以說我從學生時代一直到現在所從事的不管是研究或是教學，其實都跟方豪先生的重要理念密切地扣合。我們也知道方豪先生後來歸土的地方是在三峽，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那時候我在寫〈清代臺灣方志中的「西學」論述〉這篇文章，就是我準備要到臺北大學任教的時候，總覺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條看不到的線，把一些因緣際會牽連在一起。所以我也滿以此為榮，我沒有親身受教於方豪先生，可是教過我的老師如張永堂教授就是方豪先生指導的學生，所以等於說間接的從方豪先生那邊吸收了相當多的學術養分，也運用今天的課題跟大家分享這幾年來我特別關注的一些研究主題。

戰後臺灣地方學的發展歷程

今天的主題涉及到有關地方學與臺灣史的部分。在1990年之前，地方學的名氣不是那麼樣的明顯，可是在1990年代以後好像在臺灣的學術界突然冒出，在各個地方冒出有關地方學或是某種學這樣子的名聲，也帶動了臺灣從下而上一連串的史學運動。1990年代地方學興起的緣由，通常我們會把它歸類成幾個部分來講，第一個主要是整個大的趨勢也就是本土意識的高漲，臺灣史研究從原本非常微小的「險學」，到後來變成是非常顯耀的「顯學」。在這個研究課題裡面，相當強調臺灣的主體性，包括後來像貴校政治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成立，其實都是這樣的學術趨勢所造成的結果。第二個緣由就是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興起，瞭解社區歷史才能夠打造社區文化。當社造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要去了解什麼東西可以成為社造的重要資源；你要去探索可以成為這個社區本身的社造資源，就要去了解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有什麼樣跟其他社區不一樣的特性。現狀是歷史累積的結果，通常我們要了解一個人或是一個社區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就要從歷史的脈絡去掌握，所以這部分也跟當時所興起的臺灣史研究熱潮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從知識的建構到社會的實踐，剛好在1990年代擁有一個非常好的碰觸。然後，第三個緣由就是社區大學，它有一個明確的組織，社區大學的成立當然就是要以社區、以地方的歷史文化做為他們主要的課程，所以就會刺激本身對於地方的探索更加地熱絡。最後，政府文化部門的陸續成立，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化部到各個地方的文化局，開始要從事一些文化事業，通常會儘量地去結合民間團體，來推廣這些地方文史研究。不管是出版或者是教育文化的推廣活動，都有助於背後的一些相關研究，來做為他們進一步推展相關文化活動的基礎。以上這幾個原因連接在一起的時候，導致1990年代地方學迅速地成為熱門的話題。

學者王御風先生的〈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們現在探討地方學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篇集大成的論文，幾乎現在有關地方學的課程都會以王御風老師這篇論文的歸納與分析為基礎。該文中就有提到地方學是1990年代開始，主要以臺灣各地行政區域為範圍，所以我們後來聽到的不管是「桃園學」、「新竹學」，基本上都是以行政區域做為它們發展地方知識學的範圍，對其進行歷史社會等相關面向的研究。王老師這篇文章發表在21世紀初，所以他說是近年來臺灣地方文史研究熱潮之一，而這股熱潮一直到現在為止都還是一個熱潮，而且感覺上越燒越熱。地方學跟傳統區域研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社造，就是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的，因為臺灣史開始受到重視，在1990年代還有社區營造運動的影響，就是它有一些具體的、能學以致用而進行社會實踐的這個部分，很多社造精神注入到其中，所以文史本身是它其中的一環。然而，地方史跟地方學不能完全劃上等號，因為地方學所涵蓋的面向與某些機制，超過原本的地方史單純的學術性研究課題。地方學的推動，以地方政府、大學、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為主力，這個就是王御風老師在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地方學發展的幾種類型，以地方政府為主或是有一些大學，大學最知名的就是淡江大學的「淡水學」，社區大學像何文賢老師的文山學這個部分，社區大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力。至於地方文史團體，像三峽學其實跟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永續三峽環境文化工作室有密切的關係，是全臺知名且深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史團體。具有社造精神的社區大學與民間團體，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可能有心，但在能夠投入的力量、還有本身學術的奧援可能不是那麼強，所以地方學成績並不是那麼樣的理想。不過我想一步一步來，因為社區大學或者地方團體這幾年來也跟在地的各級學校有比較密切的合作，地方政府的文化業務也跟地方學相符，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它的經費也比較穩定，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經費穩定了才能夠從事相關文化事業的推動，地方政府也跟大學、社區大學逐漸有所合作，採用研討會與共同出版的方式，這個可以說是現在臺灣各個地方推動地方知識學、或者是形成地方學力量的主要方式，也就是以地方政府為中心，然後結合在地的社大或是各級學校，特別是以大學為主，還有地方文史團體，然後形成一個可以說是產官學合作的脈絡，這是近幾年來地方學發展越來越熱絡的重要主力。

在1990年代以後臺灣各地興起了地方學的熱潮，最早的話就是「宜蘭學」，宜蘭縣史館所推動的宜蘭學，可以說是現在臺灣各處地方學研究的重要典範。宜蘭學本身，我們能夠理解到的地方學所具有的条件它幾乎都有。此後有「澎湖學」，澎湖學已經舉辦

了二十幾屆的澎湖地方學研討會，這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緊接著像高雄、南瀛、臺南、嘉義等等。「屏東學」這幾年在屏東大學的帶動之下，也做得有聲有色，等於說整個屏東大學就是一個地方學的推廣中心，各個學院都有屏東學的相關課程，這是我們所見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彰化學」主要是由彰化師範大學推動，他們比較集中在地方文學方面的探索。除了這幾個以行政區域為主的地方學之外，像北臺灣的「淡水學」、「北投學」還有「臺北學」，這些也慢慢地蔚成氣候。這幾年臺北大學也在推動「海山學」，像貴校目前在「文山學」方面也開始有所經營。最近我也接到了輔仁大學給我的一個訊息，該校現在也開始要積極地推動「新莊學」，所以真的是遍地開花、百花齊放，可以說是一個學術盛事，很難得就是學院裡面的老師可以有這麼多的機會、這麼多的觸角，跟地方文史或是跟地方政府機關文化單位有密切合作的機制，真的是很難得，也讓地方文史的研究者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我想這是地方學帶給臺灣史研究或者歷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助力。

跨學科領域的地方學研究

如果我們從1990年代興起的地方學內涵來看的話，就好比我剛才跟大家報告的，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只是文史的研究，它其實是跨域、跨領域、跨學科的，雖然一開始關注的是一個小區域，可是在一個小區域的關注過程中，它是有很多學科的觀點、學科的力量去挹注的。我們可以看到地方學的發展脈絡與學術特點，跟一般的臺灣史研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開放性和多元性，而且非常著重於從下而上的這個脈絡。研究者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也有各自的研究重點跟他們的聚焦對象。特別是剛才廖館長有提到的，理工方面、理科方面對於地方學這幾年的發展，事實上也帶來多元的視野，特別是一些工具、方法與視野的挹注。就舉我比較熟悉的幾個專業領域，像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等等學科，它們有各自的探索主題，進入到特定地方、特定區域的時候，不同學科有它們關注的焦點，他們會以學科專長去了解這個地方、去建構這個地方的知識，然後進一步去思考這些知識如何轉化為行動，轉化為進一步改變社區、創造更多的社區力量。像是歷史學界比較著重土地的開發，而這個土地如何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面貌，也就是用時間的角度來思考地方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早期的漢人拓墾史還有原漢關係史，是歷史學者從事地方學研究最常碰到的課題。地理學界重視空間的分析，所以他們關注地方上的自然景觀、環境區位與生態等研究，地理學者進入到地方的時候，這些是他們非常重要的學術場域。社會學界的部分，比較關注都市現象的描述，還有聚落本身相關課題的分析，所以他們較常運用量化來進行分析，這個部分也為歷史學界帶來一些刺激，從理論到量化的運用，然後如何讓地方知識本身的資料蒐集及運用擁有一些理論基礎，這是社會學界給予地方學研究一個非常好的參考借鏡。人類學界的研究比較著重在都市或村落現象的描述，或者是各個族群與民俗文化的探索。所以不同學科各有其研究重點與發展脈絡。

地方學進展回饋臺灣史研究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帶給了地方學一些理論背景與研究方法的運用，同時也拓展了地方學能夠涉及到的面向。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去思考從1990年代以後，各地蓬勃發展的地方學對於臺灣史的研究有沒有帶來一些回饋的作用？特別是我本身是從事傳統

史學的研究開始起家，剛好我的整個學術成長過程是在1990年代，我也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有趣的事，這情況就是我從1990年到1994年在輔仁大學就讀歷史學系的時候，從沒有修過任何一門臺灣史的課，印象中那個時候輔仁大學只有一門臺灣史的課，而且是選修不是必修，在座的同學們也許很難想像，全系只有一門臺灣史2個學分的課，那門課是選修，開課的就是尹章義老師。我本來想說大四的時候要修尹章義老師的臺灣史這門課，結果大四的時候剛好他休假，所以我讀了4年大學從沒有修過臺灣史的課程。到了碩士班的時候，碩士班讀了4年，也只有修過周婉窈老師一門2學分的臺灣社會文化史課程。博士班的時候，也只修過溫振華老師一學年4學分的臺灣區域史課程。所以我後來在教臺灣史的課程或是從事臺灣史研究的時候，總覺得這個是反映我們那個時代、特別是我更早的那個時代，可能很多早期研究臺灣史的學者，他們一開始的專業多是中國近現代史或是中國史為主。我們在1990年代之前，基本上沒有什麼臺灣史的課，這個也可以說是當時臺灣教育的一個弔詭也是一個奇蹟，就是一個臺灣史專業的博士從頭到尾只修過2門的臺灣史課程，從大學到博士班畢業。我開始接觸臺灣史的研究，應該是大三時參與《泰山志》的編纂，這個要非常感謝尹章義老師，尹老師沒有在課堂上教授我臺灣史，可是他是在課外、課堂外的田野，讓我一開始接觸臺灣史就是從田野的角度、從實證的角度去了解臺灣社會的實際樣貌，不是一開始從文獻的爬梳進入。所以我後來接觸地方學的時候，不會覺得隔一層膜，因為我本身就是從田野開始展開對於臺灣史的認識與研究。當我從地方學回過來看臺灣史本身研究的時候，就會覺得有幾個部分是可以讓我們加以留意，第一個就是剛才跟大家報告的多元學科的借鏡與援用，我們不單單只會著重在臺灣史研究發展本身、只著重在文獻的分析、文獻的爬梳、文獻的解讀而已，我們會透過一些譬如說社會科學的觀念，還有一些數位科技的運用，這個部分給予臺灣史研究擁有更多的工具、更多元的視野。第二個是研究視野的擴大與轉向，這個部分待會我會再跟大家報告。第三個是歷史知識的致用與實踐，我們常會問一個問題：學歷史到底能夠做什麼？如果拋開所謂的賺錢、拋開可以賺很多錢的前提之下，其實你進到地方學的領域，你會發現史學能夠發揮的作用非常的廣，甚至如果抽離掉歷史本身這個脈絡的話，地方學的整個發展就會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課題。誠如剛才我跟大家報告的，跨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多元學科觀點的借鏡與整合，同時能夠兼顧理論、實務、宏觀跟微觀、動態跟靜態、中心跟邊緣的研究取向，我們現在翻開跟臺灣史有關的博碩士論文，就可以看到這方面的運用在臺灣史研究算是常見的現象。我想在1990年代興起的地方意識或是地方學的探索，對於臺灣史研究這個部分應該是有相當的刺激。我們舉一個例子，像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謀合，社會學理論的援引通常有助於增添論述的強度，傳統史學雖然在爬梳史料的時候也會做一些論述與論證，但比較沒有辦法像社會學他們本身具有的理論背景，所以他們在一些抽象的或者是一些比較系統的論述，可以展現社會學素養本身的強項，而在史學界相對來說不是那麼明顯。我們也可以看到有引用社會學理論或社會學方法的史學論著，他們論述本身比完全沒有建立在一些理論運用的論文寫作，會有相對明顯的強度。另一方面，歷史資料的引述，也有利於強化論證的深度。而近期數位工具、地理資訊系統GIS的運用，逐漸成為地方學發展的一個基本。在這幾年，史學界運用這些數位工具才慢慢的明顯化。因為我們會覺得說，就像我自己一樣，數學與物理不好才選擇了歷史系，想說這一輩子可以脫離數學、理化的魔咒，結果後來發現當你研究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些數位工具的運用真的可以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視野。如果沒有這些數位工具的話，有些過往難以處理的課題，真的就停滯在那邊；一旦運用到類似GIS等數位工具的時候，我們往往可以在空間與時間的結合上，獲得比以前更深入的掌握與了解。

關於研究視野的擴大與轉向，我想這個是地方學回饋給臺灣史研究非常重要的機能，特別是地方學由下而上的民間史學動力。我們過往的史學，通常比較習慣從上而下的視野，透過官書檔案去建構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地方學則提供了另一種方向、另一種取向，就是如何從由下而上去看地方社會對於國家機制、國家統治的回應。我們在過往的歷史書裡面看過一些話語，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歷史的知識，主要強調的是所有知識的產生都有所謂的歷史性，都有一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不管是在19世紀的歷史主義或者是20世紀的科學歷史主義，其實都很強調這個觀念。如果我們把它挪用到地方學這個層次來說的話，我也覺得說地球上所有的歷史都是地方的歷史，也就是所有歷史的產生都是跟某一個place或是某一個region、某一個area有關。地球是一個地方、社區也是一個地方，只要能夠跟人的情感意志、跟人之間相互結合的，所有的存在都可以稱為是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歷史都有它的地方性，這也許是地方學研究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示，那就是地方本身的發展脈絡，跟我們的情感意志、跟我們的了解過程，都有非常密切的連結，同時也影響了我們對於歷史研究在進行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視野。

接著我們談到是歷史知識的致用與實踐，我這邊舉幾個例子，包括像這幾年來大家在史學界相當重視的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也就是史學如何大眾化，不只是在學院裡面或是在課堂上的知識傳授而已，如何在社會上有更多的能見度、有更多的影響力，這是大眾史學或公共史學非常關心的課題。其次，這幾年教育部在推行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也提供了傳統文史或是地方學研究「學以致用」的重要場域，這個我待會再跟大家舉證。另外，十二年國教108課綱著重於探究與實作課程的進展，正因為108課綱，這一兩年來不管是海山地區或是大臺北地區的各級學校，常常會來跟我們海山學研究中心進行交流，也形成了一些學術式教學協力的平臺。所以說，這幾年來從事地方學研究的學者會覺得相當忙碌，特別是在教改之後、108課綱實施之後，對於史料課程的運用也提供了地方學能夠發揮的空間。最後就是與國發會政策有關的地方創生，地方創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地方的DNA，能夠用地方的資源去發展出地方的亮點，然後吸引一些青年返鄉，去解決臺灣整個城鄉差距以及人口外流的問題。要怎麼樣從事地方創生，最重要還是要找尋地方上有什麼特色，這個事實上也是一種社造的觀念，你要吸引人、要讓青年學子對於這個地方產生認同，產生他願意回來投入的動機、願意回來用他的知識力量去對這個地方產生效應，也就是要讓年輕學子、社區青年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可以發揮的素材、有什麼可以運用的資源，這個是地方創生的重要理念，實際上也跟地方學有密切的結合，特別是地方創生本身要有知識的基礎，這個知識的基礎往往要建立在地方學的研究之上。

當我們談到有關大眾史學的部分，一定會提到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周樑楷教授。周教授在定義大眾史學的相關理念還有在實務的推展過程中，最早是他接受彰化縣政府的委託，推動過「大家來寫村史」這個計畫，從這個計畫提出了Public History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剛好跟1990年代地方學的發展脈絡結合在一起。從那個時候開始，在臺灣各地造成了非常廣大的迴響。周老師的大眾史學概念主要有三個層次，他用的就是美國總統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然後轉化成為Public History是什麼呢？History of the public，撰寫大眾的歷史，這是第一個層次；然後第二個層次是History for the public，書寫給大眾看的歷史；第三個層次是History by the public，由大眾來書寫歷史。所以這樣三合一的層次扣緊在public從原本的客體變成了主體，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形成了大眾史學的一個完整理念。他們本身是被書寫的客體、同時也是書寫的主體，這個就是大眾史學的概念，等於說是一個大眾共同

參與的知識建構與具體實踐。

在香港有個非常知名的「華南學派」，是跟福建、廣東的中國學界所形成的一個重要且有名的學派，香港的代表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大衛教授。以前曾聽過一位學姐講說，中國大陸的劉志偉老師，也是「華南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一次來訪問新竹清華大學的時候，有人問起華南學派到底在做什麼？劉志偉老師的回答非常生動有趣，他講了兩個字：看廟。如果有機會到香港跟中文大學的老師特別是華南學派的老師進行交流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看廟的功力非常強，他們帶你到香港各地田野考察幾乎是一個個廟去看，然後跟你講這個廟背後的發展脈絡，還有目前所見相關文獻當中所透露出來的歷史訊息。科大衛教授在《明清社會與禮儀》這本書的後記，我很喜歡引用這句話，真的是個小而美、由下而上的歷史概念的建立，他說：「看完這本書的讀者，下一次到廟裡可以帶著去圖書館、檔案館的心情。鄉村的老廟就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地方史，講的是老百姓的生活。生活的苦樂，村民在這裡報告過，您聽到了嗎？」也就是說，所有地方上的人與事都是可以成為我們重要的研究主題，每個廟裡面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是值得我們記錄和探索的課題。地方學本身就是從這樣的角度，去爬梳、彙整地方上的一點一滴，而形成一個重要的知識系統。

關於USR的部分，在此就以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這幾年執行教育部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經驗，來跟大家進行分享。我們「環抱海山·深耕三峽」USR課題裡面的主要核心人物，多是歷史學系的老師，所以我們常跟歷史學系的老師及同學們講說，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去解答「學歷史可以做什麼」的場域，而不是只是關起門來說，我們到底跟理工科比起來一個月能夠收入多少這樣的單純比較而已。在此，歷史學真的能夠發揮所謂「學以致用」的功能。我們將臺灣史作為核心，也盤點了地方上一些重要的文史，好比帶著「看廟」的心情，去了解地方上重要的人、事、時、地、物，隨後彙整成一個系統，透過導覽培力、透過文資紀錄、透過傳產創生，去建構出「北大文化城的創生與活化」的計畫主軸。臺北大學於西元2000年在三峽落腳，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被三峽的居民戲稱為三峽的「天龍國」，我想這句話大家應該知道意思。臺北大學老師上完課之後坐個車、開個車就離開了三峽，臺北大學的校園在下午5點以後感覺起來是一個沒有什麼人氣的空間，而不是一個「地方」。學生也跑了、老師也跑了，所以長期以來覺得好像隔了一道校園圍牆，隔出了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們這個USR計畫，就是希望打破這個有形的圍牆，讓臺北大學真的跟北大特區形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北大大學城或是北大文化城，而不是北大特區是特區、大學是大學，永遠是兩個互不相往來的單位。我們盤點了地方，去了解臺北大學周遭有哪些重要的代表性人事物。講到三峽，就會想到國寶級藝術大師李梅樹先生，想到李梅樹先生生前所留下來的「東方藝術殿堂」，也就是他生前最大的一個作品三峽祖師廟。我們以三峽祖師廟還有李梅樹紀念館的文化導覽，作為第一個主題「導覽培力」，然後也強化了像是三峽老街還有北大特區的文化導覽培力課程，這個部分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永續三峽環境文化工作室還有三峽在地的地方文史專家，提供了我們非常重要的人力與能量。我本身接觸過好幾個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很少看到有像三峽這麼樣的團結、這麼樣的熱絡。有一次我們要舉辦三峽老街重建100周年的三鶯走路節，我們與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串連起來，結果那一年參加的人數有700多人；走到老街的時候，整個老街從街頭到街尾幾乎全是參加活動的人。所以我才說要聚集人潮，整個三峽地區文史工作者的團結力非常強，動員力也非常強，這就提供了我們在實踐導覽培力的時候非常好的助力。我覺得在座的何文賢老師應該可以感受到，三峽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能量和活力。

另外一個就是三峽本身的傳統，它在整個都市化的過程中是比較屬於大臺北地區的邊陲，反而在這個過程中保存了一些比較屬於傳統味的東西。所以我們在地方特色產業的蛻變與再生的部分，就爬梳了像藍染、茶葉、煤礦文化等等。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們知不知道三峽有茶？應該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西元2010年到臺北大學任教才知道原來三峽有茶。林果顯老師也是在2012年臺灣歷史學會舉辦的活動中才知道三峽有茶，這個部分我覺得滿可惜的。三峽有全臺灣應該說是獨一無二的碧螺春綠茶栽植，可是好像知名度不是很高，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大學社會實踐的課題，能夠強化它的知名度，進一步帶給一些年輕學子未來能夠經營的標的。另外還有黑金，還有像地方創生的食農教育，這些變成是我們在經營傳產創生的重要實踐場域。同時，我們也對於三峽老街、還有鶯歌知名的陶藝師進行相關的記錄。延續第一期的5年之後，這變成是我們跟學校、跟在地連結的重要機制，也引起了臺灣各地的一些迴響。這幾年來常常有人來造訪，希望了解我們執行這個計畫的過程，從開始的基礎研究、然後盤點資料到人事網路的建立，如何形成現在的運作脈絡。看起來好像是這幾年的事情，事實上我從西元2010年來臺北大學就開始進行，因為當時我就在教授教學卓越計畫中海山地區的特色課程，所以累積的時間更長。到今年我在臺北大學任教第12年，類似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在這12年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個系統，我覺得這個系統可以含括我們學校從課程建置到與地方文化連結的一個重要場域，提供給大家參考。為了搭配這項計畫的執行與落實，我們也舉辦一連串的一系列講座和實際考察與實作。後期就是文資調研、區域探索跟社會實踐這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就呼應了我剛才跟大家報告的「跨學科領域多元視野的關注」，因為我們所邀請來的有一半以上不是純粹的臺灣史學者，有很多是文資界的知名研究者，或者說是業界、地方文史學者或是傳統產業的重要藝師，來跟我們分享。目前這一課題執行了3年，也頗具地方上的口碑還有學術界的口碑。所以現在我們邀請學者專家的時候，他們大概知道這個系列的課題，要邀請他們共襄盛舉反而變成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因為大家有志一同，希望能夠把這個部分好好地經營起來。

剛剛有跟大家談到，地方學包括兩個重要的層面，一個是知識的建構，另外一個是社會的實踐，這個部分是與傳統史學研究有些比較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守住校園，運用我們對地方以及對文史的掌握與書寫，進一步轉化成為行動，這個行動的轉化我們希望能夠走出傳統，如同透過大三鶯走路節的執行，帶領更多社區的夥伴們還有地方上的朋友們，透過走讀、透過文史的接觸，去深入了解地方，也帶動他們對於這個地方的認同。特別是青年學子，你要他們走出校園不容易，可是一旦走出校園之後，他們實際完成走路節活動的時候，對他來說會是永生難忘。我們在「2019大河滔滔崧津遊」這一次走了18公里，從臺北大學走到大溪，走到大溪的終點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抽筋了，這個會讓你走到抽筋的學習過程又非常賞心悅目，而且旁邊有導覽老師在解說，所以一點一滴讓你去累積對地方的了解、對地方的感受，走到後來是身心俱疲，然後我們到了大溪老街又發給大家非常知名的大溪豆乾，那可能是他們有生以來吃過最好吃的大溪豆乾，這時候吃什麼東西都很好吃，所以說這個叫身體力行。走路節活動辦過5次之後，每次在走路節活動要結束前的那個點心，你就會覺得特別有味，而且會讓參與者覺得就算今年已經非常累了，明年還是會想再來。我們每一年的參與夥伴基本上都在累積中，因為已經有了口碑，而且能擁有一個非常深刻的體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透過這樣活動的舉辦並結合文史知識的建構，還有結合地方社區社會實踐的機能，去強化學校跟社區之間的永續連結。到目前為止，三鶯走路節已經走了10年了，也許未來的10年、20年走到未來的50年，那時候我可能不在，但我相信它一定是臺北大學在地方上、甚至在整個臺灣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就好比成大有「踏溯臺南」，北大有「走讀海山」的機制，各自有各自重要的結合學術與實

踐的知識傳統。這就是我們的走路節，2016年三峽老街從街頭到街尾全部都是參與者，而且有些是從中南部組團上來的。2019年是到大溪，我們那一年大概有300多人參與，結果走到大溪的時候，怎麼人越走越多，有些人可能好奇，怎麼有這麼多人在走路，結果走到後來，整個大溪老街就被我們的人潮給擠滿，這是我們2019年在大溪老街的結尾。2020年，我們從新莊走回臺北大學，走了15公里，這是在新月橋的大合照。2021年因為疫情停辦，我們用「數位海山」的方式舉辦，因為當時疫情非常嚴峻，辦什麼容易動輒得咎，所以我們就停辦。在今年度的話，疫情大約已經能夠共存，所以我們就很低調地舉辦了2022年的活動。我們在辦走路節活動的時候，會有一本手冊跟一張文史導覽地圖，形成了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學術文化傳統的過程，這個已經累積將近10年了，我想再累積10年就會變成是重要的文化寶庫，因為每一年都會有不同的路線，我們現在也已經把文史手冊、地圖做數位化的處理。2021年大溪河階走讀，那一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大家都戴著口罩來走讀，我們比較低調一點，大概維持100人次。這次活動我們也做了一個嘗試，就是希望能夠跟GIS的數位人文結合，所以特別強調是海山數位走讀系列的臺灣首場，我們第一場的嘗試。在座的各位老師、各位朋友，待會也許休息時間你們可以用手機上網打「步佈臺灣」這4個字，我們現在已經有6條路線在網站上面，是張智傑老師幫我們建置的，包括大溪走讀、包括今年的梘尾拳山走讀，都有數位路線的導覽。每條路線，都是由海山文史導覽團隊夥伴實際到現場採訪，然後書寫當地的介紹，而且會自己錄音、做成語音導覽，搭配歷史圖片與GIS去建構不同景點的數位導覽，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該景點從古到今的深入導覽。我們想說每一次走完，這條路線如果沒有把它數位建置起來，好像就變成一次性的活動。我們希望能夠在每次走完之後，如果有心循著該條路線再去走讀的夥伴們與朋友們，能夠透過數位導覽機制去完成他每一次的走讀學習。我們運用數位的方式讓它能夠永遠走下去，就不會只是一次性的活動。這個機制會越建越多，我們目標是在近期會完成約12條的路線建置。除此之外，還有下面的綠茶季，我們在明年3月分會搭配三峽在地茶農，去進行這項地方創生的推廣活動。

從在地連結到開創學術傳統

地方學雖然說是從地方、一個小地方出發，可是這個地方的連結性，往往也可以從國際的連結來理解。這個部分，我覺得臺北大學來到三峽真的是得天獨厚，三峽好山好水，既不會好無聊，而且又好風光，有很好的資源，其中有一個資源就是學習資源。我們學校來到這個地方，剛好就跟1960年代西方學界與臺灣社會的學術因緣產生連結。那時候因為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西方學者為了要研究漢族社會的民俗文化，多會以臺灣或香港作為基地。當時美國史丹佛大學就有一群人類學者來到了臺灣，最重要就是武雅士（Arthur P. Wolf），還有他的學生芮馬丁（E. M. Ahern）、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等人，循著他的足跡進入臺灣。他們來到臺灣的時候，據說是在農復會技正李登輝先生的引薦下來到海山地區，與當地知名的臺灣史學家王世慶老師連結上。在王世慶老師的協助之下，展開了他們的田野調查，很多都是在三峽、板橋、樹林一帶。所以他們後來發表的一些關於漢族社會的重要著作，這些名詞就常會出現，也會出現一個叫hai-shan海山的名稱。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讓海山地區的田野還有相關的資料，透過他們著作的流傳，變成是在國際學界大家會關注的一個田野場域，也使得大漢河流域成為戰後時期臺灣學界連結國際漢人社會研究的主要源流。在這個過程中一位重要的關鍵人物就是王世慶老師，他本身出生於板橋、然後在樹林長大，他既是樹林、也可以說是海

山地區最重要的一位歷史學者，也是海山學的開山祖師，最早用「海山」這個名詞撰寫一篇學術論文〈海山史話（上）〉。但這篇文章始終沒有〈（下）〉，因為在他的規劃裡面，〈（下）〉是要寫戰後時期。不過1970年代，大家知道那個年代寫戰後時期的歷史是有風險的，他後來也有這樣的表示。因此，他只寫到日治結束，所以這篇文章就只有〈（上）〉。從頭到尾93頁的篇幅，成為我們後來要去了解海山地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一篇非常重要的代表作。所以我們說他是海山學研究的開山祖師，同時也是淡水河流域研究的一位重要巨擘。當前學界用流域或是以淡水河作為知識建構的相關課題，也多會循著他早期在淡水河流域研究所立下的一些功夫、所掌握到的一些資料，來進行學術的探索。

我也跟大家報告，海山學研究中心結合歷史研究與學術活動，積極地耕耘海山學的課題，簡單來說就是以學術發展與社會實踐這樣的雙軌方式來推動。我們既跟地方政府持續合辦一些學術性質的活動，另外也跟地方文史團體持續合辦像是走路節等教育推廣的活動，同時也持續進行相關的出版，不管是論文集的出版或是地方學專題的出版，這些都是我們近幾年來的主題。而這樣的方式，就是目前臺灣各地發展地方學的基本脈絡。不管我們從宜蘭的經驗或是從澎湖的經驗，看到他們投入地方學的耕耘，大致上所循的幾個重要的點、重要的面、重要的脈絡，都不出這些範疇，也就是我們中心所從事的地方知識建構。在我們學校圖書館六樓所建置的海山學文物展覽館，將我們對海山的基本了解與基本知識素材，搭配建置在這個館內，希望大家用20-30分鐘左右的時間走完一圈之後，可以很快地掌握到：海山到底是什麼？海山學到底有哪些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探索的課題？在此邀請貴校師生有機會可以來參訪，今天下午是臺北科技大學的師生要過來，所以待會要趕回去。

展望未來，結合歷史考察、現狀調查與多元學科的方法運用，探究地域共同體的自然生態與人文活動，可以說是這幾年來臺灣地方學發展非常重視的課題，希望知識的力量能夠對我們所處的這塊土地，產生更大、更具體的一些貢獻。然後，第二部分是透過跨學科的視角，進行既微觀且通觀的分析研究，關注當地與他方的連結與互動，從在地的實證研究，進一步建構地方學研究的理論架構，甚至建立起一個能夠跨越各個場域、各個領域的詮釋模式。最後就是從地方學的探索與實踐，開創出臺灣本土史學的學術脈絡。我們希望從地方知識學的角度，能夠回饋臺灣史學，讓臺灣史學或臺灣研究的未來，能更具有生命力及發展性。

新北學的實例

最後我很快地跟大家分享「新北學」的實例。新北學是最近開始在進行，也慢慢形成了一個名號，這個名詞也慢慢地被叫出來，因為之前只有「臺北學」沒有「新北學」。在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臺北學的脈絡裡面；偏偏臺北縣又是在臺北市的周圍，所以很多東西都被吸收到整個臺北學的架構裡面，它本身的特殊性、獨特性沒有那麼樣的彰顯。新北學的實例，也可以呼應我們剛剛所講的，在整個地方學發展中最為成功的一個方程式，就是由地方政府文化部門與大專院校歷史學門合作，這個可以說是在臺灣這20、30年來地方學的運作最為妥當的一種模式。地方學與臺灣史研究的共筆，在新北學的案例裡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在2010年臺北縣升格改制為新北市之前，一開始的主力是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包括後來臺北縣政府文化局以及縣境各

大學院校、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地方學成果，這些成果通常是被歸入到「臺北學」的範疇，所以講到「臺北學」大家會想到臺北市，通常不會想到臺北縣，因為臺北市的名氣比較響亮。在2010年升格之後，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跟轄下各單位，希望能夠凝聚新北市境內各大學院校還有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能量，致力於建構「新北學」的知識架構、研究能量以及實踐課題。他們有來找過我們學校，這幾年來我們也形成一個合作模式。事實上，他們也曾拜訪過新北市的其他各級學校，似乎覺得距離上比較不方便，像淡江大學他們就覺得比較遠，而他們從新北市政府來到我們學校大概只要15分鐘車程就到了，所以在距離上好像比較不會有所隔閡，於是後來我們在這幾年的經營，真的就成功地打響了「新北學」的名聲。以下我從三個面向來回顧及展望新北學的發展歷程，第一個是日治到戰後時期地方志的編撰，第二個是戰後縣政府時期對於「臺北學」的耕耘，還有21世紀新北市成立之後「新北學」的開展。

通常講到地方學，有一個重要的脈絡就是「地方志」，也是我們這一次論壇的課題。地方志因為是地方的百科全書，所以研究地方學的學者，幾乎一開始多是從當地的地方志著手。像屏東學，當年他們發展屏東學的時候，老師就帶著學生閱讀《屏東縣志》，變成是他們的讀書會。我們在發展三峽學的話，《三峽鎮志》可以說是三峽學的聖經，這部志書本身就像聖經非常厚，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所有我們能夠想像到的課題，在地方志裡面大概都能夠找得到，雖然不是很深很廣，但大多有會接觸到的觸角。地方志書被視為地方學發展的起點和核心，由於其傳載著特定區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軌跡與風貌，因此成為地方學研究進一步轉譯及擴展的重要文獻資源。

在大臺北地區，從日治時期開始，不管是廳級的《臺北廳志》、《桃園廳志》還有像州郡市級的地方志書、年度要覽、街庄志等等，可以說是當時全臺灣出版量最多的區域，奠下了20世紀前期大臺北地區地方學的基礎，也成為後來從事區域史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源。我們在研究臺北地區發展史的時候，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取材對象；如果沒有掌握到這批資料的話，很多問題是難以釐清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0年代由盛清沂先生所編纂的《臺北縣志》，跟吳新榮的《臺南縣志》同被譽為是當代臺灣學界的「模範志書」。《臺北縣志》的續修從1990年代到21世紀完成，由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張勝彥教授主持，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前後總共20幾年的時間，所以一個縣志的完成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是相當龐大的。我們最近才剛完成《續修新竹縣志》，總編纂張勝彥教授，投入的學者專家有一百多人，花了7年的時間。7年完成之後，再過10幾年又要續修了，大概就是要有這樣時間上的投入。

在戰後時期大臺北地區鄉鎮市志的編纂，最重要的且出版最齊的是海山地區。我剛剛跟大家提到海山學得天獨厚，因為我們有相當好的地理位置，也有非常好的學術資源。海山地區雙和、板橋、樹林的這個系列志書在戰後時期由盛清沂、吳基瑞先生首開風氣，後來就是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尹章義教授團隊，陸續完成《新莊志》的系列志書。我就是在《泰山志》編纂期間參與尹章義老師的團隊，那時候我大三，此後也主編了《五股志》、《續修五股鄉志》。尹老師所提倡的「方志個性化」的理論，就在每一本志書裡面陸續加以實踐。近20年來臺北縣境，到了西元2006年《八里鄉志》完成之後，全縣29個鄉鎮市都有地方志書。大家也許覺得這好像沒有什麼，但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最近準備要開始進行《雲林縣志》的纂修（總編纂吳學明教授），雲林縣有20個鄉鎮市，現在只有7個還是8個有編纂地方志書，也就是說有十幾個地方還沒有地方志。大家想想看，從1949年到現在已經六、七十年過

去了，臺灣還有不少地方沒有鄉鎮市方志。而臺北縣全部滿江紅，除了滿江紅之外，續修的很多，三修的也不少，三修的就包括樹林、板橋、新店，更誇張的是有四修，雙和地區的紀錄在當時應是全國無出其右者。我也跟大家報告，《中和鄉志》是戰後時期臺灣的第一本鄉鎮志，《中和庄志》也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的第一本街庄志，所以我覺得中和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地方，雖然它在海山地區早期或是海山郡時期，一開始的發展並沒有那麼樣的快速，快速發展的時代是戰後時期，在1958年的時候就完成了《中和鄉志》。1950年代後期與永和分家之後，永和馬上就編纂了《永和鎮志》，後來彼此之間的三修、四修，似乎形成了一個競合機制，也許不久之後五修就會出來，不過現在是區志，這是中、永和所創下的臺灣志書編纂的重要歷史紀錄。

如以大臺北三大地理區域來觀察修志的數量及頻率次數，則位居盆底平原及盆緣淺山地區的海山地區最高，新莊地區、文山地區次之，北部及東北部濱海地區最低，這個大概就是在在大臺北地區的修志傳統中，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些脈絡。

當前地方志書的編纂，多是希望它變成是地方共同的歷史記憶，而不只是一種官書。過往的方式比較強調資治、教化的功能，那個是從上而下的思維。我們現在編修地方志的時候，會比較強調它是一個地方共同記憶的彙整，重視其地方百科全書的功能，因此涉及住民生活禮俗、多元族群文化、地方產經特色與觀光旅遊資產的內容，更加受到重視，這是整個方向的轉變。

戰後時期臺北縣政府對於「臺北學」的耕耘，大致上就是透過期刊與文獻專書的編纂，去建構臺北縣在「臺北學」的發展脈絡中的重要成果，到目前為止都還有繼續出版中。期刊部分，相繼有《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北縣文化》、《新北市文化》的編刊。臺北文獻專書部分，除了《大臺北古地圖考釋》、《淡水河流域變遷史》、《中心與邊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等著作，以及「文化叢書」系列的《鶯歌陶瓷史》、《臺北縣移入人口之研究》、《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北縣的舊街》之外，最知名的就是「北縣鄉土與社會大系」，這裡面的每本書幾乎都是研究大臺北地區相關課題的重要代表作，也成為我們的重要取材對象，包括像林富士先生的《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還有黃清連先生的《黑金與黃金：基隆河上游地區礦業的發展與聚落的變遷》、彭明輝先生的《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區的寺廟與聚落發展》、李明仁與江志宏的《東北角漁村的聚落和生活》、康樂與簡惠美的《信仰與社會：北臺灣的佛教團體》等等。另外就是「機關志」的出版，此為臺北縣政府時期，從區域性的方志然後慢慢地進入到特定單位的志書撰寫，《樂生療養院志》、《三峽農會志》、《臺陽公司志》、《臺北仁濟院附設安老所志》這幾本也都相當具有代表性。

文獻彙編的部分，他們也下了相當大的功夫，也是我們現在研究的時候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最大貢獻是讓日本時代的書籍中譯之後，推廣它本身的使用效益，因為早期的日文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得懂的。在2010年之前，如同臺北縣通常被視為附屬於直轄市臺北市的周緣行政區域一樣，相對於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臺北學」所擁有的代表性，臺北縣政府相關部門投入「臺北學」的成果，往往被賦予一種從屬性，也就是說它們一直在臺北市的陰影之下，沒有辦法自我形成中心，或是建立起它們的核心地位。過往的努力遮蔽於臺北市的光芒之下，也是促成了後來新北市政府力推「新北學」的重要動力之一。如同我剛剛所講的中、永和的競合例子，「新北學」在跟臺北市的競爭過程中，也慢慢地形成自己特有的脈絡。競爭本身往往是學術發展中的重要

動力，這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

到了21世紀「新北學」的開展，主要的契機當然來自於改制。改制之後，除了承繼縣政府時期關於地方學的編刊取向，後續亦有別出心裁的嘗試，致力於建構新北地方知識學的系統架構與實質內涵，一方面是朝向學術性，另一方面是朝向普及性，如此兩軌並行。相關期刊的編刊就是延續過往的基礎，最重要的是他們怎麼樣去建構，從原本的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之後，主體性要如何建立，如何去建立本身在地方學的地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及其轄下各單位，在臺灣各地地方學逐漸壯大聲勢的社會文化氣氛之下，也開始意識到如何以行政區域為主體，擺脫先前縣市混和之「臺北學」的範疇及框架，揭櫫「新北學」的旗號本身所具有的必要性與急迫性。這個必要性與急迫性，當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同仁們跟我們海山學研究中心接觸的時候，有感受到他們覺得努力了老半天，但還是一直帶有某些從屬性，從屬於臺北市這樣的一種感覺。新北市既然是一個New Taipei City，也應該有不同的格局、不同的視野。

這個時候，剛好2015年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成立，是當時全臺灣唯二的校級地方學研究中心，另一個是臺南大學的「臺南學研究中心」。我們學校成立這個校級中心的主要原因是薛富井校長本身是三峽人，希望能夠在任內透過學校的力量去回饋家鄉，所以就在他的推動之下，邀請歷史學系的老師們共同規劃海山學研究中心，成立的時候是全臺灣唯一的校級地方學研究中心，臺南大學的臺南學研究中心晚了我們一年多成立。中心成立的目的，最重要就是學校跟社區、學校跟地方各級單位與各個產官學部門的連結，進而打造一個北臺灣地方學研究的重鎮，這個是我們最早的初衷，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在此之後，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及新北市立圖書館也嘗試與海山學研究中心洽商，大家集思廣益一起努力，建構新北地方知識學。我們曾簽署一份MOU合作備忘錄，將我們近期所要進行的內容與項目條列出來，包括：一、共同辦理學術研討會、工作坊等活動；二、構思「新北學研究系列叢書」的出版計畫。

第一個部分，在新北市立圖書館典藏了一批《臺北州檔案》，這是日治時期臺北州鶯歌庄所保留的地方行政文書，共計180餘冊，約6,000餘件，是全臺灣目前保存最豐富的日治中後期（1920-1945）街庄層級行政文書。剛好日本的東芝集團提供我們一筆研究經費，讓我們充分運用這批文書，跟日本拓殖大學進行跨國學術合作。從2016年到2019年前後共3年，進行包括文書內容的摘要與提要，還有一些相關研究課題的工作坊交流，後來也邀請臺、日、韓、港等地專家學者組成研究團隊。因為資料是保存在新北市立圖書館，所以我們也透過這個計畫，跟該館進一步建立起官學合作的機制，彼此簽署一份合作協定，館方將這批文書全文電子檔提供給海山學研究中心作為內部使用。透過這批檔案，我們開始在學術方面形成「新北學」的研究團隊，首先就是舉行一連串的學術工作坊，也舉辦了今年已經第4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日、韓、新、港各地專家學者共襄盛舉。在研討會舉辦之後，我們也堅持一定要有出版，才能夠讓整個學術發展的基礎建立起來。

從《臺北州檔案》的運用開始，我們接連出版幾部專書。在西元2020年，從1920年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算起剛好屆滿百年，所

以這年舉辦「臺北州建州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到了2021年正好臺灣文化協會成立100周年，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蔣朝根先生是我們中心的諮詢委員，所以我們也與該基金會合辦「文協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當然這裡面一定會有《臺北州檔案》的專題研究，希望能夠延續官學合作的基本脈絡。文協百年的研討會專書，也即將在12月出版，我有帶來前兩年的專書提供貴圖書館典藏參考。我們即將在2022年12月9日到10日舉辦「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誠如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王先生是海山學開山祖師，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來表達海山學研究中心對於王世慶先生的追思與感念，因為受惠於他的專家學者非常多。我也向大家報告，自從我們舉辦學術研討會以來，沒有一次像這次這樣順利，才開始邀稿大約10多天，就已經有21篇稿件，以前都要邀個一、兩個月才邀得到10幾篇，本次不到兩個禮拜就有20餘篇，主要是因為有很多他的親友、學生以及受惠於他的學者專家來投稿。王老師可以說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等於是我的師祖輩。在此也邀請在座的老師們屆時能夠蒞臨指教，這個研討會我想會是近期臺灣史學界重要的集會。

關於「新北學研究系列叢書」的出版計畫，我們正在構思中，或許在明年度會開始推動。以新北區域為核心，每期擬定各種主題，如家族、人物、族群、藝文、宗教信仰等等，期待未來能夠陸續出版，也許假以時日，10年、20年之後，就能慢慢地形成像我們所看到的「南瀛文化研究叢書」、「臺南文化叢書」、「澎湖文化叢書」、「彰化學叢書」那樣，變成指標性的地方學出版品代表。

另外，新北市也建置了一個「典藏新北學」網站，包括「關於新北學」、「再現礦山」、「遷徙新北」等頁面，也跟國家文化記憶庫連結。這個網站的建置內容，可以看出其試圖將新北學形成重要學術傳統的決心，他們對於新北學也有所定義，這是一種觀看新北的方法，來了解關於新北學的脈絡，網站就提供給大家參考。新北市立圖書館內也建置一個「新北學典藏中心」專區，部分主題是我們和圖書館一起規劃的，包含展示與相關收藏以及後續的出版計畫。講到這邊，我想跟大家報告的一點就是，所有的活動、所有的知識建構，最重要的都還是在於人。我們看「臺北學」其實運作很久，但氣勢始終沒有辦法起來，「淡水學」和「北投學」反而因為有重要的學術單位和關鍵人力的投入，像「北投學」就是洪德仁醫師以及北投社區大學的努力，就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學團體，可是像臺北學就始終沒有那麼樣的明顯。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在知識建構還是社會實踐的場域，所有地方學的成形與建立，最重要的還是成事在人、事在人為。「新北學」因為有一位關鍵人物，如果不是有那位關鍵人物，我們也不會如此積極地朝向新北學塑造的方向進行。我把自己瞭解地方學的哪些條件加以傳達，希望新北市圖在地方學的建置能更有活力，而那位關鍵人物就是去年度拿到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的王錦華館長。王館長是學理工科出身的，可是他對於文史很重視且有敏感度，「新北學」的建置主要就是提出來的。我們跟他們合作，包括新北市圖提供《臺北州檔案》原件電子檔來進行後續研究計畫；我們合辦研討會，他們也固定提供經費來進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出版，這都是王館長促成的。如果新北學沒有王館長，也許「新北學」現在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已，不是一個具體的名詞。在新北學的發展過程中，王館長可以說已經留下重要的歷史地位。這個是他得獎時的感言：「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它是知識轉譯的空間，終身學習場域，擔負著社會教育及照護功能，來到這每個人，都能找到他舒適閱讀角落，獲得被照護的方式」，讓人感覺到他具有相當深刻的人文素養。他常說自己是學理工的不懂文史，但我

每次跟他對話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他對於文史的重視與關懷。

最後，許雪姬教授在〈臺灣學·地方學·桃園學〉一文中，為「地方學如何成立」列下了8個指標，強調只要具有4個指標以上即達標，等於該地方學已經成形，稱為「某某學」即可當之無愧，就請大家參考指標內容。海山學研究中心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發展的「新北學」，也是從這幾項裡頭去梳理脈絡，去找尋我們現在能夠發展的方向，真的非常受用。包括像「文山學」等各地方學在推動時，這些指標是相當必備的。根據這些指標，新北學基本上已經達標，我們大概已推動了10年，算是十年有成，完成了新北學的知識基礎，接下來就是進一步能夠走多遠、多廣、多久。

近年來，我們還是持續努力地進行《臺北州檔案》的研究，期許在建構「新北學」的主體性並發展出特色的同時，透過跨學科與跨地域的視角，針對後續新北學研究叢書等計畫的執行，能夠凝聚出更多的專題分析與整合探索。另外，在關注當地與他方的互動交流之際，更希望能從在地連結國際、從國際反思在地。我們除了進行地方研究，也不斷地與國際學界進行一些交流，不管是香港華南學派或是韓國濟州大學、日本拓殖大學等，他們的地方研究都做得有聲有色，我們也希望在交流的過程能夠獲得更多的養分，未來能夠積久功深，開創出堅實的研究典範與學術傳統，立足於臺北大學與新北市立圖書館等單位的合作基礎上，真正能夠形塑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學研究團隊。

在進行「新北學」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還是不斷地警惕自己，所有以行政區域所形成「某某學」的地方知識學脈絡，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界線，我們的眼光不要只看到新北，不要只看到海山，最重要的，這是我們研究的起點而不是窠臼，也不是我們的界線。所以不要畫地自限，我一直跟我們的夥伴們強調，不管是海山也好、新北也好，它是我們研究與推廣的起點，是我們知識建構與社會實踐的焦點，而不是窠臼與界限。在海山學文物展覽館的入口，我們就提到「從海山出發，立足大臺北，放眼北臺灣，展望全世界」，這才是我們的發展標的。

最後，就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廖迪生教授，也是華南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文化人類學與華南研究〉中的這段話，讓大家看到從多元學科的角度，用一種開放的視野去了解地方學的何去何從，這裡提到「狹窄的地域觀念只會束縛學術研究的成果，我們需要超越觀念上的限制，把華南變為研究的起點，以華南的個案去了解地方與國家的關係，與鄰近地區，以至世界各地相關聯社群的關係，與不同地方和學科的理論對話，去尋求研究上的突破」。在此，「華南」這兩個字是可以不斷去做替換的，可以是「文山」、可以是「桃園」、可以是「海山」、可以是「新北」，只要我們擁有如此的觀念，在發展地方學脈絡的過程中，就不會讓人家覺得我們只是侷限在一個小的區域，而沒有一個大的視野。我覺得還是那句老話「成事在人」，最重要的還是「事在人為」。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報告，謝謝大家的聆聽，敬請指教！

*現任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文山地區地方史修志經驗

詹瑋*

館長、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大家早安！我叫詹瑋，畢業於政治大學中文系，在南部教書幾年之後，再回來臺北讀歷史研究所。

跟剛剛洪教授所講的一樣，我讀歷史研究所的時候，是以研究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為主，臺灣史基本上是很少或幾乎沒有。我在歷史研究所畢業以後，到東南工專教書，在教書的過程中，慢慢接觸到地方史，才發覺自己的不足，所以決定再回來讀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基本上，我從大學到研究所，都是政大，因為地緣關係非常大。

今天研討會的主題主要跟方豪教授有關，剛好我的指導老師許雪姬教授是方豪教授的學生，所以基本上我算是他的徒孫。

我大學時代住在考試院溝子口附近，溝子口那邊有方豪先生駐地的場所，就是一個天主堂，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今天來這邊講文山地區地方史的修志經驗，是一個巧合。因為前一、兩個月我到政大圖書館蒐集資料，準備寫論文，不小心被館方人員抓到，才有今天這個機緣來這邊演講，有點誠惶誠恐。

《深坑鄉志》的編纂

先講前言。民國74年，我從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來到東南工專任教。有一天在《歷史月刊》服務的歷史所學妹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歷史月刊》想要作一系列臺灣老街的報導，因為我服務的地點東南工專在深坑，所以她想請我寫一篇深坑老街的報導文章。我看了一看，那個時間點跟剛剛洪教授提到的1990年，就是民國80年左右，我第一篇地方史的文章，是民國80年，開始採訪呢是民國79年，所以時間點是接得上。

我答應了之後，當時我對深坑還不熟，剛好有一位中文系的學長在深坑鄉公所擔任村幹事，所以在他的引介之下，認識深坑老街上的一位耆老叫做黃宏福，他在日治時期深坑教育場曾擔任過類似主任秘書的職務，對深坑非常的了解。經過多次採訪，並且到各歷史古蹟勘察，寫出第一篇有關地方史的文章，就是〈從老街話深坑歷史滄桑〉，在民國80年的7月刊在《歷史月刊》第42期。

第二年，我在訪問石碇的老鄉長高筆能之後，於民國81年6月發表了〈石碇懷古〉，刊登在《歷史月刊》第53期。我在訪問這些老人家之後，心裡總有些莫名的哀傷及惆悵，因為這些老人家看到有人來跟他採訪，心裡是很高興，因為這些東西他跟他的小孩或孫子講了千百遍，他一開始要講，這些家人都全部跑掉，願意留下來聽他講的只有我，因為有個傻瓜肯留下聽他講以前的故事，他真的很高興，所以每次在跟他們告別的時候，他們都依依不捨。那這些老人家現在都已過世，像石碇這位高筆能，我訪問他的時候，已經90多歲，他是民國前6年生的，他到90多歲呢，自己一個人從石碇坐公車到臺北市，自己去玩，這位老人家非常厲害，我問他其他家人，他說他的兒子和太太皆已過世。

後來呢，在民國82年5月發表了一篇〈木柵探源〉，刊登在《歷史月刊》64期。其實我寫論文的速度蠻慢，我經過採訪，再聽那些錄音帶，整理成文字，都要花一點時間，所以我每篇文章的間隔都超過一年。

像我訪問木柵前幾任的老鄉長，訪問鐵觀音茶輸入到臺灣的張迺妙後代，然後訪問各個耆老，所以要寫一篇文章，其實相當不容易。

到了民國83年3月發表了〈景美訪古〉，刊登在《歷史月刊》的74期，這些呢，都是我曾經發表在《歷史月刊》的文章。

後來，本來下一篇文章要寫新店，但那一年考上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有很多的報告要寫，所以沒有時間繼續。

因為連續採訪那麼多，我感覺到自己對臺灣史的所學不足，所以我在民國83年考上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在84年年底，當時臺北縣深坑鄉民政課的一位曾先生跟我聯絡，他說深坑鄉要找人編纂《深坑鄉志》，他知道我在深坑已經作了一些研究，問我願不願意參加。我跟他說我現在正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如果你們要找人，建議直接找政大歷史研究所。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所裡，當時的主任張哲郎教授決定組成一個編纂團隊，爭取《深坑鄉志》的編纂工作，當時另外有一個編纂團隊背景比較雄厚。後來新舊系主任張哲郎教授及林能士教授，林教授是我研究所導師，他也在前陣子剛剛過世，還有一位廖風德教授，廖教授當時是副總統連戰辦公室副主任，所以背景也很雄厚，他一出馬，另一個編纂團隊就自動退出。

後來我找深坑鄉長黃明和懇談，把這些年我在深坑，不管在景美溪南或景美溪北兩邊山區跑的資料、所照的照片給這位老鄉長看，其中包括鄉長的老家三腳木訪問鄉長父親的照片，他一看說，連我父親你都訪問到，覺得我們做的工作相當不錯。經過公開招標的程序，政大歷史所因為實力雄厚，脫穎而出獲得了鄉志編纂工作。

民國85年的5月，政大歷史系和深坑鄉簽約，6月編纂團隊正式組成，其中包括我東南工專的同事林惠娟老師，以及政大歷史系呂紹理老師、毛知礪老師和博碩士班的范燕秋（范燕秋後來到師大臺史所，也在前幾年過世）、陳鴻圖、張建俵、張世瑛、許毓良

等人。總編纂是系主任林能士教授，由於我對深坑最熟，原先規劃由我主持，但林老師考慮到我那時還是學生，所以改由呂紹理老師總負責，我擔任執行編輯。

陳鴻圖老師那時候因為在當兵，就由他的系助教張曉寧代理，另外還有大學部及碩士班的助理。

當初在簽約的時候，政大歷史所允諾除了編纂鄉志之外，另外再編一本鄉志簡編，這個工作張哲郎所長就交給我來做，篇章的分配上，林惠娟老師負責地理篇，我負責開發篇，陳鴻圖、毛知礪負責行政篇，我和呂紹理、張世瑛、許毓良負責社會篇，呂紹理負責經濟篇，范燕秋負責教育篇，我和林惠娟負責文化篇，我和范燕秋、陳鴻圖負責人物篇。

深坑鄉公所和鄉代會在提供資料方面可以說非常的配合，譬如說陳鴻圖要的選舉資料和鄉公所各課室的資料，還有我要的祭祀公業的資料都提供的相當完整。

我們那時候在編纂鄉志的好處就是說，後來政府發覺祭祀公業資料其實涉及隱私，不能隨便提供，但那時候幾乎是全部提供，所以後來我們在鄉志續編的時候，就沒有這種福利。其他像戶政事務所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像我那時候研究陳秋菊，陳秋菊在日治時期是在除戶簿裡，後來因為整個戶政資料全部數位化，所以必須經過申請，再跟戶政事務所要資料。

另外，像衛生所、警察分駐所、各教育機構，在我們拜訪後，都順利提供資料。

林惠娟老師，我後面還會再特別講，就是真的需要有專業人力，才會使整個方志更好。林老師在內政部服務時，負責整個中華民國的地圖繪製，她這次特別繪製的深坑地圖，還有她透過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取得的深坑衛星影像，讓我們的鄉志加了不少分。

這次鄉志編纂，除了林惠娟老師發揮她在內政部工作的地圖測繪特長，特別編製了深坑鄉地圖，我們大概每二、三個禮拜就會開一次工作會議，希望這本鄉志對鄉民來說是有用的。像剛剛洪教授所說，鄉志不只是拿來看，還能拿來用，所以我們特別繪製了深坑鄉名勝古蹟示意圖，把深坑鄉的名勝古蹟包括炮子崙瀑布、王軍寮瀑布，還有三級古蹟永安居，另外像德興居、福安居、德鄰居、興順居，再加上茶路、白馬將軍洞，白馬將軍洞聽說是白馬將軍陳秋菊當初抗日時，日本人派憲兵警察軍隊追捕他的時候，他逃到深坑昇高坑的山上，根據深坑鄉民耆老的說法，裡面大概可以藏一、二千人，但是後來鄉公所的秘書帶我們去看，它在烏月山上，大概藏幾個人就差不多了，他們說可能是因為地震坍塌，要不然原來可以藏很多。

我和東南科大的一些老師，那時候去走新店獅仔頭山，獅仔頭山當初也是抗日軍的據點，就是錫口（今松山）的詹振，詹振後來在圍攻臺北城的時候被殺，他弟弟詹番在獅仔頭山繼續抗日。我們在走的時候，也看到有一些山洞，也說是當初抗日軍時躲藏的山洞。

另外包括開墾碑，開墾碑在深坑國中旁，一過昇高大橋，過景美溪，旁邊有土地公廟，會有一個開墾碑。在國內各地方有開墾碑的，我印象中不多，但是我們看到的時候，感覺它應該是在戰後時期所樹立，上面寫的就是當初開發昇高村最早的三個人的名字。後來，我們再過十幾年再編《深坑鄉志續編》的時候，我們再去找，已經被鄉公所漆上彩色，可能是為了外觀比較好看，但是，即使它是戰後初期的古蹟，你把它漆上彩色，等於是破壞了。這個就是部分地方行政人員在古蹟維護上的觀念，並沒有與時俱進。

還有石媽祖路碑，是深坑山上很有名的景點。當初在日本時代，你要上山朝香，因為路比較隱密，所以附近的鄉民修了以後就立碑。這些我們都把它繪到圖裡面。

另外，我們在編鄉志的時候，也希望趁機會把深坑街的現況作一個澈底調查，主要調查就是戶長姓名、建築物基本資料及使用情形。在調查的同時，我們順便問問看家中有沒有古契約和老照片。

所以關於深坑的調查，深坑街呢確實差很多。我們是在民國84、85年，第一次作深坑老街整個調查，在民國96、97年續編的時候，我們重新再作一次調查，這中間就差很多。有的地方已經重新建大樓，有的戶主已經換了，也開了很多吃的，所以說都不太一樣了。

我們利用9月一個月的時間作調查，完成以後作成「深坑老街調查結果表」，附上一個圖，圖裡面我們是根據深坑老街地籍圖，手繪每一戶每一戶，姓什麼，經營的行業是什麼等等，我們把它弄上去。

剛剛洪教授提到衛星GPS等等，我記得也是在民國96、97年左右，我跟林惠娟老師及剛剛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李豐楙教授，因為李教授在大陸、香港、星馬各個地方，還有到中南部等地方作調查，惟一沒有調查的就是他住了幾十年的木柵，他覺得很可惜。有一次他上課，因為我老婆在輔大宗教研究所上課，上課的時候在政大就是李教授的課，他一直有這個心願，想作木柵的研究，我老婆跟他說我老公就是作這個木柵研究的，後來李教授看到我的博士論文之後，就找我一起做。他找我和林惠娟提的計畫是一個綜合性大的計畫中的子計畫，包括夏鑄九和不少古蹟學者，他們有很多的團隊，都一起做一個大的計畫。

在我們作木柵村研究裡面，林惠娟老師決定引用Google科技。例如我們看到一個乾隆20年的一個契約，如果是典藏在中研院史語所，上面大概就是說，因為在日本時代，他要證明這塊土地是你的，你要把契約拿出來，中間就是說，他的地籍圖的編號，那我們就根據地籍圖的編號，利用Google把它弄出。像這家土地剛好在政大道南橋邊，就是現在正在大興土木的對面，我們就用這種方法，後來發覺，全國各地很多歷史研究團隊，也都在用。

這個深坑老街的平面圖，任何一個人一看這幅圖，就可以知道老街中各家的姓氏及職業，是了解深坑老街很好的一個資料。

范燕秋教授在採訪深坑國小的過程中，獲得了日治時期深坑公學校的一手資料，都是原始資料，所以她的教育篇寫得相當有內容。如果《深坑鄉志》有30萬字，她教育篇裡深坑國小大概就將近十分之一。

許毓良教授把深坑大小寺廟全部調查一遍，並且繪製深坑鄉宗教據點分布圖。那個時候他只是一個大一學生，是毛知礪老師的助理。相當不簡單。

林惠娟的水文地質調查也相當專業。呂紹理的人口統計，因為呂紹理是研究社會史，也為社會篇增色不少。

在名勝古蹟調查方面，我和林惠娟老師走遍了深坑南邊二格山系列和北邊土庫山系，把所有的名勝古蹟作了詳細調查。在人物志方面，我們請教深坑前鄉長黃世濊，決定哪些人要入傳。

在〈深坑最初的拓墾〉這一章，我原來其實也寫得差不多，只是手中資料指出深坑在早期有集體開墾的現象，我們看它契約內容一再出現「吳高陳」、「吳高陳張潘」、「七股吳高陳張潘」、「公司大約」等字樣，應該是存在一個開墾組織，只是找不到明確的證據。

其實你在做地方史或方志的時候，契約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碩士班的時候，古契約資料非常少，像尹章義教授有一次演講，我請教他，因為他手中契約很多。我問他有沒有深坑，他說有，但他不太可能借你。基本上，我碰到的教授裡，溫振華教授是比較大氣，我和溫教授都做大文山地區，溫教授心胸非常寬廣，他有什麼資料，無論是什麼心得，都樂於與你共享。我覺得這是研究歷史的一個典範，像我跟一位深坑當地文史工作者，我們兩個都認識，他的資料只進不出，那就很難了。

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其中文山地區的原住民就是秀朗社。秀朗社大概大臺北地區整個南邊呢，我們講說雷朗族或者秀朗社或雷朗社，那秀朗社人在哪裡，我也不知道。後來溫教授講說他們在新店，在下石厝，大概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姓潘的。後來我照他講的地址去找，就秀朗社他們族譜這方面的資料就出來了。所以這方面我也是蠻感謝溫教授。

後來在無意中，很多事情我覺得是緣分。當時東南科大後面要建學生宿舍，有一些墳墓，那你要建宿舍，墳墓要遷，所以就請鄉公所公告3個月或6個月，如果沒有人來，那我們就依相關規定進行處理。後來東南科大山下有個高家，就是東南科大山下的一個銀行，銀行其實就是高子綿祭祀公業，高子綿祭祀公業裡面的派下，就是開墾深坑的主力人物。高家有一個墳墓就在現在宿舍那個山上，公所要求說這個墳墓是你的，你要提出證明，他就拿來乾隆年間的一個契約，上面蓋有「萬順吳高陳記」的公章，證明當初有吳高陳墾號的存在，這墾號我們用白話來講就是開墾公司，就是當初漢人來這邊開墾，一方面要跟原住民簽契約，一方面要找一票人跟他一起開墾，尤其是像開墾水圳這些呢，都需要相當多的人力，所以最後也為我撰寫的這章開墾篇畫下完美的句點。

《深坑鄉志》後面，我跟林惠娟老師，一個從歷史觀點，另外一個從地理觀點，合作深坑地景之頁，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深坑地圖，那就是林惠娟老師所繪，繪得相當專業。

民國88年，當時臺灣省文獻會出版品評鑑結果出爐，他們是委請中央研究院作評鑑，《深坑鄉志》榮獲第三名，當時第一名是我爬山好朋友張素玢教授編的《北斗鎮志》，第二名是洪敏麟教授《草屯鎮志》。然後有一些馬路消息，原來第一、第二應該都是我們的，但因為洪教授地位比較高，所以我們就變第三。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後來林能士系主任率領呂紹理教授、范燕秋教授、陳鴻圖教授、我和林惠娟老師出席受獎，並且和當時的鄉長呂玉環合影。

臺北市《文山區志》的編纂

再來就是編纂臺北市《文山區志》。剛和何老師在聊《文山區志》，我說《文山區志》的錢真的非常少，大概是我們編《深坑鄉志》的十分之一不到。

民國94年臺北市政府要各區編纂區志，文山區公所打電話給我，說臺北市政府撥了30萬給文山區公所辦理文山區志編纂工作，文山區公所輾轉知道我，請我擔任審查委員。審查委員開了幾次會，大家都覺得錢那麼少，傻瓜才會來投標，當時我也是叫的最大聲，結果後來我就變成那個傻瓜。因為錢太少，幾次都流標，文山區公所經過招標流標之後，市政府就把經費收回。

後來文山區公所跟風俗改善協會募了36萬元，區長李美麗親自來拜託，她說因為錢真的很少，沒有人要做，問我可不可以。我和林惠娟老師商量之後，因為林惠娟老師是木柵土生土長，父母親都是木柵國小的老師，她從小就在木柵國小長大，對本土的感覺特別深厚；而我的老家雖在臺南，但在木柵也住很久，兩個人都是文山區住民的身分，應該不計報酬，義不容辭接下這份工作。

當時我和東南技術學院（東南工專升格）從事鄉土研究的一群夥伴，還有文山區的文史工作者，組成團隊來投標，最後順利得標。講到文史工作者，如果你開始作地區史的，90年代是差不多，那個時候像臺南，我老家在臺南。臺南最早成立的文史工作室是赤崁文史工作室，是我哥哥的一個老朋友鄭道聰所成立的。後來各地方紛紛成立。除了社區大學之外，文史工作室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一個地方研究的起點。但是，文史工作室有強有弱，像深坑的文史工作室，林姓及楊姓。林姓是畫家，平常自己本身就訪問很多老人家，但是兩個又不合，最後分家。基本上，他們的實力還是不夠雄厚。像木柵的文史工作者是一對父子，姓徐，他們之前報出去做土地公廟，做個專案。以我自己的經驗，如果要做方志，基本上還是學術單位來做，地方文史工作者雖然有興趣，雖然有去著力，但是研究方法，還有許多方面就是能力不足，所以作出來的結果不如人意，很多原因是因為有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參加，就是無法保持一定水準。有一次我參加臺北市客家委員會的一個論文研討會，我是評論人，當時也是研究新店安坑很有名的一位莊華堂老師，我問他格式方面的問題，他後來找我說：「老師，我又不是學術界的人，你跟我要求那麼嚴？」我說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學

習，第一次較困難，你就看人家怎麼寫，第二次、第三次就會駕輕就熟，如果你真的要發表論文，這些方面還是真的需要。

那我們就組成一個團隊參與投標，也順利得標接下區志編纂的工作。

經過多年的採訪寫作，拜訪耆老，有時到各廟宇古厝照相，有些古厝在山上，就探勘這些路徑。

那在幾次耆老座談會中，耆老都是踴躍發言，他們期待區志能夠早日完成。在此期間，我們這些區志編纂夥伴也是不辭辛勞，努力以赴，他們編纂的時間相當晚，從94年的8月到95年的5月，雖然極力精簡，但是完成的字數也有15萬字，超出原預計的字數。由於經費不足，只印了幾本給區公所結案，其他的作成光碟，現在上文山區公所的網站，還是可以看得到。

《深坑鄉志續編》的編纂

再來講到編纂《深坑鄉志續編》。東南工專在民國59年成立於萬順寮，期間曾得到鄉長的大力協助，才能夠順利設校，所以對地方這些，是非常的感恩。

民國85年，我和林惠娟老師參加《深坑鄉志》編纂團隊，負責地理、開發、社會、文化及人物志等篇章。從86年到98年前後兩任鄉長都跟東南保持良好互動，在這期間，深坑持續的繁榮發展，也舉辦了很多精采的活動，深坑豆腐之名，也藉著活動提升至國內外知名的程度。

民國96、97年以來，深坑老街逐漸進行街屋騎樓的改造計畫，深坑國小禮堂被臺北縣列為歷史建築，整個深坑老街的街區改造，包括建平埔橋、捷運延長等計畫，都是以前在鄉志所沒有寫到的，所以在鄉代黃建強的強烈建議下，希望我們把這些重大改變作一個完整的紀錄，決定委託來作這個鄉志續編。

時間的關係，我們就快一點。

這個大家就參考一下。

這個是我們東南科大編纂的老師。

這是工作分配。

這也是工作分配。

民國97年8月21日深坑鄉公所在臺灣採購公報網公布「97年度《深坑鄉志續編》專案採購案公告」，在招標文件上敘明編撰續編的緣由：為落實傳續鄉土人文關懷之信念，並避免珍貴文史資料流失，爰結合地方可運用之資源及關心地方文史工作者之力量，經由積極之鄉志編纂執行作為，透過地區史料之蒐集整理，彙編本鄉鄉志以為傳承，俾彰顯施政績效，並提供關心本鄉未來發展研究者研析參考之資料」。

東南工專因位於深坑鄉，深感鄉志續編工作具有重大歷史意義，身為本鄉最高學府，自是義不容辭，便積極參與投標，並於97年9月4日得標，專案時程至98年8月31日，總經費為98萬元。得標後組成編纂團隊，由11位老師分別負責大事紀、地理篇、開發篇、行政篇、社會篇、經濟篇、教育篇、文化篇、人物篇等篇章之撰稿，由我負責總纂。

編纂團隊透過拜訪地方耆老、機關、學校、寺廟、教會、農家，以蒐集資料，同時還要攝影及錄音，可說是十分辛勞。

因為深坑老街越來越繁榮，我們就想說是不是這次可以幫鄉志用一個英文的版本，我們學校剛好有英文老師，王慧老師她就負責英文版本。

經過一年的採訪撰寫，終於在民國98年8月完稿，約有14萬字，一方面保留部分從前的歷史，做了詳實的紀錄，希望能夠在臺北縣升格成直轄市的前夕，為深坑鄉留下蛻變的最後身影。

其實鄉公所也要政績，鄉代也是一樣。你做個鄉志，他們的照片都在裡面，這個才是最大的原因。

這次鄉公所把原來12年前的《深坑鄉志》包含進來一起印，因為他們覺得原來《深坑鄉志》做得很好，所以他們就把這兩本，等於是原《深坑鄉志》重印，這樣就是很好。

執行訪談的原則

在作鄉志的採訪，有一點像記者，也有一點像警察或是調查員，你要訪談什麼，要事先做好準備。第一個，你手邊的所有資料都要熟悉，像地方史相關資料、舊報紙、其他口述歷史成品、受訪者背景的了解、準備要問的問題等等。

第二個，務必事事穩妥。比如說你要錄音，錄音機電池是否足夠，要不然錄到一半，就尷尬了。那是不是有備份？約談時間再確認，因為有時候老人家會忘記，所以你去之前，一定要再打個電話作確認。

修志經驗分享

好，那修志經驗的分享，這才是今天的重頭戲。

從民國84年到現在，我們累積了一些地方志的修志經驗，我個人覺得有一些因素是可以直接影響修志的成敗，基本上臚列於下：

第一要有充足的經費。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良好的方志，沒有充足的經費，一切都是奢談。我們當初第一次編《深坑鄉志》的時候，原來差不多400萬，後來鄉公所刪到380萬；《文山區志》，我剛講過大概就是30萬上下；《深坑鄉志續編》，原本應該是100多萬，後來刪到96萬。

有充裕的經費，每位撰稿者都可以分配到一個助理，用於協助採訪、調查、蒐集資料、整理採訪稿，所以在人力的運用上相對的充足。因為經費充裕，我們還派了一些助理到當時的臺灣文獻館，在省政府那邊，當時呂紹理老師率領一批研究生下去影印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深坑相關的契約，當然現在都已經數位化，可是當時還沒有。

總體而言呢，《深坑鄉志》因為經費充裕，製作出來的成品，在三個方志中，水準最高；臺北市《文山區志》經費最少，呈現出來的作品只能算是差強人意。

第二就是有經驗的領導者。修志通常會找有修志經驗的個人或團隊，因為有過修志經驗，對篇章的安排、人力的配置、經費的分配、地方調查、人物採訪都駕輕就熟。其次才會找地方人士推介對本地素有研究的人。

我博士班畢業以後，有一次有一位長久在新店做文史工作的老朋友夏聖禮老師來找我，他說：「詹老師，我跟我們圖書館推薦你來做《新店市志》。」那時候很心動，因為我的博士論文中也不少寫到新店，馬上回家跟老婆稟告，但她說你接接看！所以後來沒有接。後來很像是由尹章義教授率領的編纂團隊接的，因為臺灣在編纂鄉鎮志的時候，其實出現一些專門接鄉鎮志編纂的公司，尹老師很像是有。那《新店市志》很像是不是就是他的。我原來對這些編纂團隊覺得可能不怎麼樣，後來因為我擔任開發篇的審稿，發現其實還不錯，因為他的研究生找了我好幾次，我覺得還滿嚴謹的，後來出來的《新店市志》的水準，我覺得還不錯。

第三，掌握在先的研究。因為一般編纂方志的團隊，我想在座的有修過方志的人都知道，政府的企劃幾乎都是這樣。將近一年的時間中，搜集相關資料、做好田野調查採訪、編成文字稿，時間上其實相當緊迫。你開沒有幾次會，就結案。所以相對來說，我在參與《深坑鄉志》編纂的前幾年，已經在深坑作了一些基礎的採訪調查，而且發表了幾篇關於深坑的研究，像深坑的開墾史，我大概就已經初步的探討，那時候在東吳大學的地方學研討會就有發表，擔任評論的很像是溫振華教授，所以說這是在編纂《深坑

鄉志》占優勢的地方，因為起步比較早。

第四就是在地人的配合，包括文史工作者或是地方的頭人。以我第一次在深坑的採訪經驗為例，因為我學長在深坑鄉公所當村幹事，他介紹了深坑街一位耆老黃宏福先生給我，他對地方事務及地方歷史了解最多，所以對我第一篇地方史的文章幫助非常大。

在木柵做採訪的時候，也是有人介紹我去找前鄉長張榮森，張榮森又介紹我去找木柵其他地方頭人張乾生、謝坤等等，真的像粽子一樣，只要抓住其中一個，就一串粽子整個出來。所以我在做《深坑鄉志》的時候，找到了前鄉長黃世濊，然後其他地方頭人就一一浮現。所以節省了我們很多人力。

第五就是撰稿者與專業配合。今天早上我把power point作了更新，加強林惠娟老師的部分，因為講到專業，就是她。就方志的總纂而言，當然希望各篇章撰稿者的專業能與所撰寫的篇章屬性契合度高，但通常沒有辦法完全作到，所以我們最常看到的場景就是一票撰稿者全部是歷史學專業。

就《深坑鄉志》的編纂而言，我找到東南工專的地理教師林惠娟老師撰寫〈地理篇〉，有其專業訓練，出來的作品就非常出彩，《深坑鄉志》能獲得全國第三名，〈地理篇〉寫的好也是其中重要因素。當時審她稿子的一位師大教授，林惠娟就載著他到深坑二格山、土庫山和深坑各個角落，沿途記下動植物，非常仔細。這是林惠娟老師所繪的地圖。

林惠娟老師最近還上新聞。東南科大這四、五年來都跟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由東南科大數位媒體設計系透過AR、VR的技術把臺圖的古地圖進行數位化，讓走進圖書館的讀者親自體驗古地圖裡面的情境，誠如剛剛洪教授所說，就是一些新科技的運用。

她這個可能就是在聊天中，因為臺圖跟東南科大其實就是蠻熟的，就是上課筆記工整，繪製了這個地圖，他們老師很像給她將近滿分，媲美教科書。

臺灣圖書館就是把她大學時代的上課筆記作了數位典藏，畫得非常專業。

第六點蒐集的資料夠豐富。你蒐集的資料愈豐富，對方志的撰寫愈有利，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和林惠娟老師在做《深坑鄉志》之前，在地方上跑了好幾年，北方的土庫山系，南方的二格山系都跑遍，對名勝、古蹟、瀑布等瞭如指掌，對地方人物的採訪也作了不少，族譜、古契約的蒐集也不遺餘力。

第七點注意細節，防患於未然。你在採訪的時候，採訪完，訪問稿出來，一定要請對方簽名，因為有時候受訪者過世，對方的後代可能不認帳，所以要確認及簽名，以免日後產生糾紛。

另外，就是有些技巧。例如跟人家借東西，記得要簽收。

最後，謝謝各位的聆聽。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退休副教授

方豪的臺灣地方志研究成果與影響

盧胡彬*

前言

廖館長、林所長以及在座的貴賓先進專家學者，大家午安！今天很高興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場合來講我一生非常欽仰的方豪先生的相關的課題。我剛剛去二樓參觀了這次的方豪先生相關主題的特展，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最講究的就是感恩圖報。以方豪先生來講，他當年無私地把自己所有的藏書捐給政大，政大圖書館也將這些圖書史料好好地保存而且還將它們發揚光大，我覺得這個就是保存文化最好的方式，所以特別在這裡提出這件事情來講一下。

從今天早上到現在，我聽到兩位專家學者在談地方志。在編修地方志這個方面來講，我接觸的應該比兩位學者多非常多。現在，在編修地方志這方面，有些人的心術是非常不正確的。譬如說有一種在編修地方志的時候，編纂者會很認真的去收集很多的資料，可是之後這些人卻會把這些資料佔為己有；還有另外一種在我自己個人經驗裡面是，收集好了的地方志資料，交給鄉公所進行典藏，但在不同黨派的鄉長就任之後，就將原先入藏的地方志資料全部丟掉。這些作為，對於地方志的保存來說真的非常可惜。尤其以臺灣來講，在地的歷史資料因為可能經歷了各種的天災、人禍，能保留下來就已經很不簡單了；透過編修地方志的方式能夠收集到這麼多資料，卻有些人把它當成私人收藏或是不願意好好地維護保持。所以我覺得政大圖書館可以將這批方豪先生的資料好好把它保留及利用，這真的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為若這些資料沒有好好地被保留的話，現在有很多原本原件，我們可能都已經看不到了。

提到方豪先生，早期李東華先生幫他編輯了一本年譜，而在這次特展中的年表也已經將他重要事情都標示出來了。那我這裡再稍微地提示一下好了。方豪先生，字杰人；除了杰人之外，他自己還取了很多的別稱。出生在浙江諸暨，後來因為他父親的關係，搬到杭州去了；清宣統2年出生，民國69年的時候去世。方豪先生非常了不起的是，他以4年小學的學歷加上12年天主教修院教育的學歷，沒有受過一天正式的史學訓練卻能夠成為文史方面的一位傑出研究學者。而且更偉大的是，方豪先生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方豪先生的學歷來講，在成為中研院院士時，確實引起了一些爭議。當時是蔣中正先生慧眼識英雄發現當時任職神父的方豪先生，一直這麼認真的在從事史學的研讀學習，著有很多相關的研究著作，故而提拔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實我們如果以方豪先生的學術成就來講的話，作為院士絕對是資格相符的。

就方豪先生的學術研究方向來講的話是具有多元開創性的，譬如說像宋史研究、像中西交通史研究、然後還有臺灣史方面的研究。我今天所要介紹的是臺灣史研究裡面一個小小的專題。也就是方志學的部分。方豪先生為什麼會特別注重地方志？因為他很注意重視近身之學，方豪先生不單單只在臺灣進行地方志的研究；從抗日期間，方豪先生在昆明、在遵義、在重慶他都有研究當地方志的成果。所以當民國38年方豪先生來到臺灣之後，就開始往這個方向進行研究。方豪先生在臺灣居住了32年，在有關於臺灣史的研究方面，成果是非常地輝煌，而且臺灣史的研究也是由他開創的。

早期在臺灣戒嚴時期，研究臺灣史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所以方豪先生開創了這個新的研究風氣是非常不簡單的。方豪先生的治史的精神可以被稱為「史料學派」，這種研究精神是具有時代性，因為此一時期的史學講究史料學。這個學派的精神在於寫文章的時候，盡量都是會長篇大論地去引用原文，希望呈現的是不要去誤解了引文原始的意義。

方豪先生來臺灣之後，他第一篇的學術研究就是跟臺灣有關的。而方豪先生開始他研究臺灣史的問題時，是從讀臺灣的地方志開始的。所以在他的臺灣史的研究裡面比較重的比例是跟臺灣的地方志有關的。而我自己本身是專攻方志學的，也有很多修地方志的經驗，所以當我讀博士班的時候，我原先是要拿方豪先生當博士論文的主題。可是當時那個年代，方志學是邊疆學，非主流學術；博士論文要以這樣主題作研究的話是不允許的，所以只好改成歷史地理，去做地緣政治的研究。

研究動機

首先提到方豪先生的研究動機。他在民國57年的臺灣光復節提出自己19年前來到臺灣，把臺灣當作是第二故鄉，把臺灣文獻視為自己的鄉邦文獻，找出失佚的《恆春縣志》、《苗栗縣志》，從日本引進高拱乾所編修之《臺灣府志》，從北美取回陳文達編的《臺灣縣志》，最主要的是《臺東州采訪冊》的作者胡傳，方豪先生也把他找出來。經過這樣的努力，大家才發現原來臺灣這些地方志的重要，因此將地方志跟方豪先生的一些相關研究全部展現出來。

再進一步就方豪先生的研究做仔細的分析時，會發現方豪先生之所以會研究臺灣地方志，最主要是因為發現在臺灣的方志裡有提到利瑪竇的問題。早期方豪先生在從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時候，發現早期這種史料都受限於日本資料的影響。因為無法判別日本資料的真偽，而尋求本土資料的來源，無意間發現臺灣的方志裡面有有關利瑪竇的問題。因此繼方豪先生本身宗教界關係的研究後，開啟了他的這個有關臺灣史方志研究的這個領域。

其次來講的話，方豪先生我們剛剛也講過他是史料學派，所以他是非常重視史料學的，尤其是在方志學來講，它本身的史源學是一定要搞清楚。像現在臺灣的一些現代的方志，必須釐清它是創修？是重修？是續修還是新修？都搞不清楚這樣不可以。當你的名稱定在那裡時，主要呈現的內容跟組織就是不一樣的。續修的話是一定要有前志，要有新的內容組織出來讓你加上，可以加以說明。資料的編抄，前後組織的統整，不可以違反地方志它該有的地域性的特性，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方豪先生這麼重視史源學的原

因。

第三個動機是因為方豪先生他熱愛臺灣，要把這個臺灣的文獻發揚光大，這個跟他本身的近身之學有關。像臺灣人你愛臺灣是對的，但是對於這些把臺灣當做是第二故鄉的外來者而言，你怎麼可以不知道這些臺灣事呢？所以方豪先生就主張要把臺灣志發揚光大。

第四個是他不滿意前人的研究成果。因為當時有關於臺灣方志的研究非常少，若有，就都是日本人做的研究，而且因為在殖民統治時期當然也沒有人敢去質疑，所以基於這兩個因素，方豪先生他開始努力地去研究。

第五個原因是方豪先生非常留意臺灣士人對整個修志的貢獻，尤其是對那些最基層的工作人員。一般來講，修地方志的時候一定要配合在地的這些人來完成，因為畢竟這些基層人員才是資料的來源，所以表彰基層人員也是很重要的。

第六個動機是有感於臺灣文獻的散佚和隱沒，方豪先生讀《臺灣通史》時發現史料多為抄襲，缺乏很多相關資料，而參考日本人做的《臺灣全志》也是太不完整。所以方豪先生就希望趕快把這個方志整理出來，就提出所謂的「訪求和保存」、「整理和研究」，主張要結合一些愛好的人，可能是一個組織、一個團體，有人來領導，然後不斷去挖掘，再進行一些座談會、研討會，才能相互的去探討。

第七個動機就是當時時代的一個背景，要去強化中國大陸跟臺灣文化的關係。

草創時期的撰述

就方豪先生的著作成果，我用自己的分析標準把它分成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稱它叫草創時期。那個時期大概是從民國38年他來到臺灣之後一直到民國40年。這是方豪先生新的研究工作的開始，因為他原先是以中西交通及宋史研究為主，所以臺灣方志（史）這個新的主題，他很認真地學習，也成為後來他的研究方向。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方豪先生有很多大膽的想法提出來，針對前人的研究不滿意，然後來激發他研究的動力。在這個時期最大的貢獻是幫忙尋找佚失的方志，並且在版本上進行問題的修正與整理，像在這次展場裡所陳列的《裨海紀遊》，就是經過方豪先生整理之後，才變成現在這個完整的版本。

這個時期重要的成果，第一個就是方豪先生從《諸羅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三本地方志裡面發現臺灣在修地方志的時候會使用新資料。因為在康熙53年的時候臺灣有測繪的地圖，在《諸羅縣志》中就有使用，雖然方豪先生批判說這個用的不

好，但在後來的《臺灣縣志》、《鳳山縣志》，也都跟著利用。

第二個成果就非常重要，就是他很深入去研究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為了研究利瑪竇，方豪先生開始把臺灣方志編修排列成年表，說明文獻間相互抄襲的情況。發現引述利瑪竇臺灣星野說是《諸羅縣志》，而此縣志的編輯人陳夢林將其利用陳元麟的說法進行編輯最後歸之利瑪竇。原因是清初以來利瑪竇的名聲太大，一切西洋學說皆附會於他，那時臺灣星野說也是這樣的情形。再提到陳夢林為什麼引述陳元麟的說法？是因為兩個人曾經同事過，一起同修《漳州府志》。還討論了從我剛剛提到的《裨海紀遊》中發現《諸羅縣志》裡一個有關於利瑪竇比較完整的記錄怎麼不見了？方豪先生發現我們在用的《諸羅縣志》這個版本是由日本那邊再傳回來的。是因為縣志傳到日本去的時候，剛好遇到日本鎖國時期，而將這些提到利瑪竇的書籍列為禁書，甚至刪掉。經由以上種種，方豪先生延伸出更多更細的相關研究方向。譬如說：方豪先生要去看前人研究的臺灣方志到什麼程度？他就必須有前人研究成果的收集，然後從中發現有哪些錯誤。再者，要了解臺灣的方志到底修了哪些？他就把它整理成年表。在臺灣方志研究的領域中，方豪先生大方分享之前相關研究成果，到了後期臺灣方志研究的相互因襲，因而發展出一個所謂臺灣方志形態的學說。還有因為陳夢林跟陳元麟的關係，延伸出兩個研究方向；第一個是修志專家與臺灣人士；第二個是中國大陸跟臺灣文化關係。

第三個研究成果是因為方豪先生自己是浙江人，他就依照從臺灣地方志上面看到的，闡揚了浙江人與臺灣的修志關係。

第四個，就是針對日本的著作中臺灣漢文文獻的錯誤加以修正。因為在當時，臺灣籍的學者所使用的資料全部都是參考日本的，但是就算是當時被臺灣史界當成聖經的伊能嘉矩的著作也是有很多篇幅的錯誤，方豪先生一一把它糾正出來。

第五是方豪先生發現《恆春縣志》，這部分的話這次的特展有詳細的介紹，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

然後第六個成果是訂正《臺灣通史》〈藝文志〉。連橫先生所著的《臺灣通史》，雖然連橫先生很討厭日本人，但是沒辦法，他的資料來源都是抄自日本人的著作，尤其是使用伊能嘉矩的部分。在這個〈藝文志〉部分，我們以前所謂的〈藝文志〉其實就是書目，方豪先生也仔細地將書目謬誤的部分給修正了。

成果的第七項，起因是方豪先生感念臺灣文獻一是變亂太多；二是因為臺灣的氣候潮濕蟲害嚴重；第三個是因為很多修臺灣地方志都是外省人，他們回去的時候就把它帶回中國大陸去了，因此造成了臺灣文獻的散佚。方豪先生認為當下迫切的工作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訪求和保存」、「整理和研究」。怎麼去做？方豪先生認為，第一個要趕快培植能夠整理跟研究臺灣文獻的人才；第二個的話是要聯合對臺灣歷史和臺灣文獻有興趣的人士組織小規模團體，舉辦座談會、演講會、展覽會並發行會刊；第三個步驟是籌備一個全省的文獻展，這些步驟後來就變成一股潮流。

第八項成果是方豪先生找到《苗栗縣志》。《苗栗縣志》在臺灣本島就不見了，但在中國地方志新版的目錄出來之後，方豪先

生發現在他曾經服務過的徐家匯天主堂有收藏；方豪先生就請他的門生幫忙謄抄一部，然後輾轉的寄到臺灣，為此方豪先生還特地寫了一篇文章加以說明。這個時期的臺灣方志方豪先生已經看了很多，發現除了劉良璧所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自成一型外，其他方志相互因襲可以分成高志型、諸羅縣志型、淡水志型及采訪冊型這四型。其中高志跟周志是草創型；諸羅縣志型就是以范余二府志為代表；淡水志型是《淡水廳志》及《苗栗縣志》這一類；采訪冊志跟《恆春縣志》是一類。這樣的一個分類型態，以我們現在的了解是有點問題，不過以當時來講的話，這樣的志型可以比較簡單讓你使用這個方志時，要怎樣下手查找。就地方志而言，你只要掌握體例，你就知道你所需的資料在哪裡。在傳統的地方志中的資料是不重複的，若你不懂得怎麼樣去掌握它的體例的變化，你就不知道你現在要找的那個資料，要到哪裡去找。

第九個就說明《諸羅縣志》有〈凡例〉跟〈圖說〉，《臺灣全志》裡沒有〈凡例〉跟〈圖說〉，還有修志人士也沒有，經方豪先生追索把它列出來。在傳統的方志裡，凡例是很重要的，如果可以把它完整表示出來那是最好的。

第十個的話是對連橫《臺灣通史》的新探，對於〈藝文志〉裡面的問題，提出糾正。

第十一點是公布《臺東州采訪修志冊》的纂輯人是胡適的父親胡傳，方豪先生是從相關的資料考訂，然後再加上胡適的父親自己的紀錄確認。

第十二個的話就是刊行林豪的《澎湖廳志》的〈凡例〉。就林豪而言，在方豪先生的心目中他是清代一個非常重要的臺灣籍的一個修志專家。我剛剛講過在方志裡，〈凡例〉是最重要，所以方豪先生就將找到的〈凡例〉給刊行出來。

轉型時期的撰述

第二個時期叫做轉型期，是從民國41年到54年。方豪先生又重新再思考自己在這個領域裡面要怎麼來翻轉？所以他慢慢的想要跟自己前面的研究做一些區隔。而且方豪先生之前已經把很多相關的資料找出來了，所以他就開始對方志重刊下功夫，而且在這時期他實際參與《臺北市志》的編纂。

這個時期第一個要增訂臺灣方志的研究資料，因為經過方豪先生的努力，除了他自己之外，也已經蔚為一股風氣，所以可以把那些在做相同研究的人加進來。

第二個的話是要表彰清朝初期臺灣士人的修志表現，這個範圍就劃定到乾隆6年為止。劃定到乾隆6年是因為這些方志是最早期、最重要的，而且這個時期來講的話，他們大部分都是創修，是後面模仿或抄襲對象。第二個因為在清代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士人比較少，而且他們沒有什麼出路，以前的士人，若是考不上科舉考試，要嘛就開私塾、要嘛就去修志。這批修志的士人，總共

有32個人，其中參加4部和3部志書編纂的各有2人；參加2部志書編輯工作的有3人。這些是以有實際參與的才算，像什麼繕寫、校刊、刊印那些就沒把他們算在裡面。方豪先生認為在這些修志士人裡面最值得表彰的，第一個是王喜、第二個是王璋、第三個的話是陳文達。其實王喜這個部分在後來我們研究的結果是有問題；至於陳文達這個部分，倒是真的值得鼓勵的。因為他是從最早的、最基層的做起，到最後能夠變成最主要的首席編纂，表示陳文達是真的好學。另外來講的話，像李欽文也是為4部志書效過不少力的。

方豪先生結論主張這些古的方志的刊行是刻不容緩的，這也對當時學界影響很大。當時省文獻會有一個臺灣地方志的展覽，甚至還為此出了個特輯，方豪先生就針對這件事情在文獻專刊裡面提出他的一些看法與批判。另外就是方豪先生考訂一位杭州鄉賢錢的在臺事績，這項比較不重要就先不提；接下來就是把《苗栗縣志》重新刊行出來；方豪先生還寫了一篇臺灣的文獻與方志的文章，而且方豪先生把把自己收集到的高拱乾所作的《臺灣府志》將它刊行同時也為其寫序，將其取得過程及該本非原刻本講得清清楚楚。這樣的行為對目錄版本學的研究非常有幫助。

第八個的話，方豪先生序跋《恆春縣志》跟《臺灣縣志》，這些就是方豪先生在《臺灣文獻叢刊》所做的；其實《臺灣文獻叢刊》方豪先生他當時的貢獻是很大的。以當時而言，剛過來那時候臺灣的研究其實是一種禁忌，方豪先生花了那麼多的錢，出刊了這部叢刊，所擔負的壓力是很大。而且在編輯這部叢刊中，且不管方豪先生他的斷句是對還是錯？他已經盡力正確地斷句以方便後人閱讀，這個貢獻是非常大的。最後就是方豪先生他自己親自在民國54年的時候纂修《臺北市志稿》卷4〈社會志〉的「宗教篇」，這本「宗教篇」總共有10章。內容依照當時內政部裡的相關資料進行編輯，成為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反省時期的撰述

第三個時期是反省時期，從民國55年到民國63年。方豪先生做學問不是像某些人完成了之後就不會變了；他寫了一篇文章之後，若後來又發現新的資料或者是覺得前期的思慮不成熟，他會進行修訂。所以在這個時期，方豪先生開始做一些早期作品的修訂，還刊行了《方豪六十自訂稿》。以這個時期來講的話，成果表現就是他寫的一篇關於若干臺灣方志的新認識。因為有新資料朱士嘉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增訂本》的出版，讓很多原先看不到的收藏方志都出現了，進而很多地方就開始再重新討論。這篇文章另一個重要的是方豪先生是第一個去提到臺灣第一本的方志，絕對不是高拱乾所修的，而是蔣毓英的《臺灣府志》。第二個是方豪先生講出修志專家這個問題。他號稱修志專家這個名詞是自己杜撰的，他說凡是修志書次數2部以上就可以成為修志專家，因為修第二部時會從第一部的經驗裡面去得到一些工作上的訓練，他就把修志專家統計出來如書上所附這些。修志專家被提出來是非常非常重要。像我們第一次去修地方志的時候，只能照書修；但是書本講的有時候是行不通，你就一定是在碰了壁之後，才會從中得到一些新的經驗，此上午第二場演講的詹教授就講很清楚。經常參與修志的人，都很清楚一部方志修得好不好？存在許多因素，譬如經費就是很重要的，給10萬元跟給2萬元當然會呈現不一樣的水準，因為兩者運用的資源很不一樣。又如修志修到最後，裡面的細節

技巧都是從實戰經驗裡面出來，所以一個好的修志專家就很重要。以政大歷史系的做法就非常好，老師帶著學生，學生又當上了老師，一代接一代；這樣子的修志才會是最好的。所以方豪先生就非常在意這個修志專家。

第三點在主編《臺灣方志彙刊》上，方豪先生因為張其昀的囑咐而出版了《臺灣方志》；原先要出版26種，後來因故只刊行了23種。這一套書方豪先生重新整理了書上的標點符號，還有一些校刊上的問題，而且也分別撰寫總序及個別的序或跋。每一本書的序跟跋，對於所謂的目錄版本學方面的研究是很重要的部分。

第四個的話是重探歷史上浙江與臺灣的關係。方豪發現蔣毓英修定的第一部《臺灣府志》還有之後的《苗栗縣志》及《恆春縣志》，這些都是跟浙江有關。

接下來第五個就是自刊《方豪六十自定稿》，若是想再對方豪的一些學術研究和個人基本上的認識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套書。《方豪六十自定稿》分為上下冊，加上補篇共3冊。另外還有方豪敘述六十七先生的修志成績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等其他作品，我就不一一介紹。

成熟時期的撰述

最後就講到方豪最後一個時期：成熟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他過世的前兩年，最主要作品大都集中在民國67年，因為後來他後來身體就不好。為什麼稱成長成熟期？方豪自己講說他擅長做專題，但是他專題一直收一直收，收到有一個大的概念的時候，開始寫通論性，就表示他在這方面的學問已經成熟了。以方豪先生來講的話是表現在他自己出刊發行的《臺灣人文》刊物上面，總共只分三期寫了清代前期、中期還有後期，寫了三期有關於地方志修纂的工作。其中，前期他最重視，因為站在史源學的立場，開始是最重要的。討論的篇章大概就是這些，譬如說王喜的《臺灣志》和《臺灣志稿》，季麒光的《臺灣郡志》（未成稿）。這個部分等於是對臺灣修志做了一個總整理。之後就寫了中期，中期的部分就是從《澎湖紀略》這些這樣子下來，但也差不多都是配合清朝的年代去作。最後就講到臺灣後期的這個方志、典型。後期就是以《臺灣通志》及相關的採訪冊做一個總結。這些採訪冊的內容是告訴我們古方志如何去做田野採訪，此直到現今依然值得參考利用。

最後，方豪所做的臺灣地方志的研究工作，在救國團辦的活動裡面，就把前面三個部分集結起來成為一本書，書名為《臺灣方志研究》，可是它有加一個副標題《臺灣地方志的編纂工作》。

影響與貢獻

方豪先生的學術論述，差不多都講完了，那我們就依照他的學術論述的內容來談一下他的影響與貢獻。

方豪先生對於臺灣地方志而言，你絕對再怎麼樣都不可以磨滅他的功勞，第一個就是他蒐集、輯印了臺灣的舊方志。例如：《恆春縣志》、《苗栗縣志》、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完整版以及《臺灣縣志》；還有主編一套《臺灣方志彙刊》；最重要是把第一部的《臺灣府志》找出來。其實第一部的《臺灣府志》它的內容還要再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因為現在一般研究方志學的是比較懂現代學術，比較沒有辦法理解舊方志的內容，甚至還帶著批判。其實，清代臺灣的舊方志是當時的清朝人以慣例看世界，這個慣例眼中所看到的東西是要呈現或報告給中央政府的，方便中央認知臺灣，制定臺灣的治理、策略，對於清代臺灣的研究意義重大。因此蒐集、輯印了臺灣的舊方志，方豪先生的貢獻是十分偉大。

第二個的話是闡述清代臺灣方志的發展歷史，內容有序跋、有方志的編纂工作；另外，更提出臺灣方志形態說。

第三個是整理和利用地方志。比如說像《諸羅縣志》的〈凡例〉及〈圖說〉的出現；比如說《臺東採訪冊》是誰作的？還有林豪的《澎湖廳志》，還有公布臺灣方志的研究資料，這些對臺灣方志的研究都很重要。然後還有糾正有關臺灣的方志的研究缺失，尤其是日本的部分，以及臺灣通史的部分。方豪先生也去特別提到說，像臺灣方志裡面再運用一些新資料，其實他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我們修方志的時候，新的資料是一定要用，不是只有舊的參與才是重要。

第五個是提倡修志以人才為重，而且身體力行，比如說表彰清代士人的修志表現，肯定臺灣方志的修志專家，然後還親自去修《臺北市志稿》。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語，基本上方豪先生研究臺灣地方志，是從臺灣方志中有所謂利瑪竇的星野說深入研究下去，然後延伸出了我剛剛所提的各期成果；尤其重要的是，方豪先生在一個個小專題做完之後，就把它總結成為一個清代方志的編纂，為臺灣的方志研究開拓全新的格局。就現今的方志學研究內容與方向，大約有八個面向，一是關於地方志書發展史的研究、第二個是關於方志學發展史研究、第三個是繼承方志的遺產、第四個是向方志要材料、第五個是發展方志理論、第六個是明確新方志的編輯原則和方法、第七個健全修志隊伍、第八個是深入了解國內外收藏研究，利用中國地方志的情況。檢視方豪先生的研究，在這個八個方面都有論述。因此，如果講說方豪有自己的方志學也是OK啦。

最後引用許雪姬對方豪的讚譽。在臺灣史方面許雪姬說：「以現在臺灣史研究採用新的方法，出現許多新的資料，而且有不少史學家投入的情況下，再回頭來看方豪所做過的研究，有些都沒有過時」。我贊同此一說法，除了以這句話來對方豪表達尊敬外，更鼓勵對臺灣方志學充滿熱情的專家學者能夠秉持方豪先生的精神，繼續耕耘。簡報完畢，謝謝大家，請多指教。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臺中市地區有關歷史書籍、地方志書發展探討（1896-1934）

朱書漢*

摘要

日治時期的地方志書發展中，起初的重要目的是要讓日本人認識臺灣，因此會看到有關地方的介紹書籍中，或多或少介紹旅遊方式與交通，如《臺灣名所寫真帖》。但後來則發展出有區分統計資料並有地方發展沿革及名勝古蹟介紹的書籍，另在旅遊說明交通方式說明減少，如《臺灣事情》。

此外針對臺中市的相關介紹中，會發現到原本書中某些章節進行，促成從日治時期臺中地方志書的發展，如《臺灣事情之宣傳》某些章節有針對臺中統計資料與論述，到《臺中州大觀》形成以臺中州為主題的地方志書，再到《臺中市管內概況》以臺中市為主進行專門統計，之後出版的《臺中市史》成為臺中市地方史料的集大成之作，不僅有了現今地方志書的雛型，更是日治時期臺灣地方志書的標竿。

如此本研究以1896年撰寫有記錄到臺中史蹟的《史蹟名勝調查報告書》為本研究時間起點，到1934年出版的《臺中市史》作為研究終點，探討臺中市相關的地方志書發展脈絡。

關鍵字：《臺中市史》、地方志書、大觀、概要、市史

壹、前言

在日治時期有關臺中地方志書發展以前，臺中地區就有被書籍所介紹，並針對當時的臺中名勝古蹟、歷史記事進行論述，如《臺灣名所寫真帖》介紹了臺中街到臺中市的發展沿革以及古蹟名勝。但對於臺中相關數據記載，如農林漁業、人口、以及相關金融業統計，便沒有刊載在這類書中，臺中相關的統計資料則多半在官方內部的統計書中，如《臺灣事情》、《臺灣事情之宣傳》等，但關於專門針對臺中地區的介紹與相關統計記載的地方志書，則要等到1920年後才有所出版。

1920年10月1日實施州制的相關律令，將臺中廳、南投廳、彰化廳合併成臺中州，並在10月1日成立臺中市，與此同時也催生針對「州」、「市」的地方志書出版，如1922年出版的《臺中州大觀》，書中除了專門針對臺中州的發展進行介紹外，也將相關統計資料進行分類記載，便有了現代地方志書的雛型。此外在1920年臺灣成立的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1924年設立的基隆市、高雄市，1930年設立的新竹市、嘉義市、1933年設立的彰化市、屏東市等。這些市成立以後，各地編撰自己城市歷史的「市史編撰計畫」也相繼被提出，最早執行的則是臺北市，由田中一二等編纂，臺灣通信社所於1931年出版的《臺北市史》，緊隨《臺北市史》其後出版的市史，則是1934年《臺中市史》的出版。

《臺中市史》在編排上如章節的安排與《臺北市史》有些相似之處，如開篇以介紹各自城市的發展沿革等，但《臺中市史》針對資料整理則編排更為詳細，章節目錄也較《臺北市史》更有系統，如針對金融除了介紹臺中市的發展沿革外，也網羅如臺中車站的載客量、手押臺車線的運量、信用組合的會員數等統計資料。回顧《臺中市史》的編輯歷史，從1927年6月時由當時的臺中市尹遠藤所六召集臺中市史編纂委員，並由氏平要等19位組成擬定了編纂大綱以及古書紀錄查閱傳說與新聞收集等，在1931年8月至1932年2月則是由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囑託猪口安喜等人進行校閱，之後進行排版。如下為《臺中市史》的編撰關係者：

表1

《臺中市史》的編撰關係者

市尹	遠藤所六、小島人三郎、名和仁一、古澤勝之、曾根原弘
助役	團部薰、古澤勝之、河野十郎、宗藤大陸、福田看、拔井光三
委員	氏平要、高濱利久、野末誠一、田村勉、田中米藏、安部英喜、洲濱文太郎、荒木三郎、大山正名、杉本主二、小野一郎、肥後杉雄、長井實一、小川滋、吉田作太郎、加藤虎太郎、赤木虎雄、高澤三平、石垣孫保、本島信重、謝宗賢、西川政藏、內田賢吉、邱雲艷、黃腹、角田哲雄、渡邊壽倉、星萬壽雄、北橋千代作
編輯者	原田芳之、丸尾秀夫
校閱者	星萬壽雄、中袴田雄吉、大岩榮吾、宗藤大陸、名和仁一、猪口安喜

參考資料：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編纂關係者〉，《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年），目次前10頁。

作為日治時期重要的歷史文獻，《臺中市史》是日治時期臺灣地方市史研究中最為完整，編排資料最為詳細的市史，甚至在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還典藏了《臺中市史手稿本》，成為研究臺中市的重要史料。^[1]如此以1896年撰寫有記錄到臺中史蹟的《史蹟名勝調查報告書》為本研究時間起點，到1934年出版的《臺中市史》作為研究終點，來探討臺中地區地方志書到出版《臺中市史》的發展。

在《臺中市史》出版以前，便有許多關於臺中地方介紹的相關書籍出版，從這些書籍的出版定位與撰寫內容的變化，更能看出日治時期地方性質的改變，如《臺灣名所寫真帖》刊載了臺中西門外景，臺中街道全景及當時駐紮在第二旅團本部的照片，^[2]另外在《臺灣旅行案內》中介紹了當時的臺中火車站的周邊景點如臺中公園。^[3]上述這些書籍著重在深入淺出的介紹臺灣給日本人所認識，並在交通方式的進行解說。

又如《臺灣》一書當中便介紹了臺灣的發展通史，篇幅介紹。^[4]1916年10月創刊的《臺灣事情》則介紹了各地主要的街區，以及相關的名勝古蹟如八卦山、赤崁樓等。^[5]會發現到這類書籍在交通方式說明的減少，撰寫的重點則放在名勝古蹟等介紹。同時還有乾脆不寫交通介紹，專心在名勝古蹟介紹的書籍出版，如杉山靖憲撰寫的《臺灣名勝舊蹟誌》，介紹當時臺灣的景點與古建築，但如何到達與交通方式則沒有任何論述。^[6]又如山川朝章著《臺灣風景寫真帖》，也是在介紹全臺灣各地的著名建築與景觀而不去介紹交通方式，並介紹了臺中市內的名勝古蹟。^[7]看到有關臺中地區介紹的書籍走向專業化，並且有相關的統計資料，如田中一二編著《臺灣事情之宣傳》針對了臺灣的風俗民情、教育、工農林業進行統計與介紹，其中分類介紹了方法便以各州與各市在每個項目中分類介紹，也就包含了臺中市。^[8]

這些統計資料與沿革介紹的書籍，逐漸區分地方而發展成「地方志書」，如介紹臺中州並記載相關資料的志書中，有泉風浪著《臺中州大觀》，該書便對臺中州地區有了詳實論述，並針對了臺中州地區的產業、人口等進行統計與沿革介紹。^[9]在《臺中市史》出版之前有關臺中市自己的地方介紹與相關書籍，則有臺中市役所編著的《臺中市管概況》，其中所論述了除了介紹臺中市的當前規劃、歷史沿革外，還針對當時臺中市內的相關統計進行分類與介紹，是當時了解臺中市的重要資料。^[10]另外像針對臺中市的名勝古蹟介紹，也出現了刊物地圖中，如由金子常光編著的《臺中市要覽》，便對臺中市的發展沿革與著名景點進行介紹，並擺入如《臺中鳥瞰圖》之類的手繪地圖外補充說明。^[11]最後由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則是臺灣日治時期臺中市歷史與資料統計的集大成之作，內容編排詳細並統整了許多資料數據，也是日治時期內容最為完善的市史。^[12]因此在戰後編撰的臺中地方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參考日治時期出版的《臺中市史》，如1999年出版由張勝彥等著《臺中市史》中，其中如日治時期臺中的發展沿革，相關經濟數據便有取自日治時期的《臺中市史》，^[13]在後來臺中縣市合併前由陳靜瑜等編《臺中市志》中，也參考了不少該書的統計資料，如臺中市的歷史沿革等。^[14]而除了臺中市內的研究外，關於尚未縣市合併前的臺中縣地方史研究中，如張勝彥總編的《臺

中縣志》，許多有關日治時期的發展沿革以及數據統計中都參考並引用到該書。^[15]

有關相關研究的部分，則有蔡秀美著〈1917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一文中，則可以了解到松岡富雄1917年擔任臺灣新聞社社長直至1944年，任期高達27年，因此該研究可以了解到《臺中市史》發行的歷史背景與資料研究，作為本研究的參考。^[16]又如蔡蕙頻著〈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以泉風浪著作為中心〉，則是針對泉風浪的著作與社會運動進行分析，提供本研究關於泉風浪背景的參考。^[17]此外由郭佳玲著〈台日地方史志纂修的比較研究——以新修之《台中市志》與《山口縣史》為例〉則將《臺中市史》與《岡山市史》進行比較，其中的編撰過程與內容以及編撰關係者的研究。^[18]

貳、臺中地方志書誕生與書籍發展

日治初期為了幫助日本政府治理臺灣，因此出版許多介紹臺灣各地發展以及名勝的書籍，主要目的便是幫助日本人快速的了解臺灣，更因書籍的介紹而前往臺灣，如1896年撰寫的《史蹟名勝調查報告書》，其中該書的內容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御遺跡〉的章節中，提到有關能久親王辦公的廳舍，臺中廳彰化郡境內的紀念碑文等，也介紹的史蹟如臺北芝山巖、基隆的社寮島、臺南的熱蘭遮城、高雄的鳳山舊城等。^[19]又如1899年出版石川源一郎著《臺灣名所寫真帖》刊載了很多日治初期臺灣的市街影像，如臺中西門外景，臺中街道全景及當時駐紮在第二旅團本部的照片外，^[20]在該書篇章〈臺灣旅行案內〉中也介紹了臺灣當地的旅遊路徑，例如如何搭船從日本到基隆以及刊登船班時間，還有從基隆港到臺北城市的火車發車時間以及票價等，此外也針對當時如何到達淡水港以南的地區的交通方式予以說明，會發現到當時到達新竹以後，許多的旅遊地點的交通建議便以搭船走海路到各地進行旅遊，^[21]顯示了臺灣當時陸上交通的不便。而針對臺中部分，則介紹如何前往「東大墩街」，^[22]以及在當地下榻處如春田館、小川館等進行介紹。^[23]

日治時期隨著當時的旅遊業的發展與旅遊人口的增多，許多介紹旅遊景點的書籍雨後春筍的冒出，此外陸上交通的改善，如手押臺車的輕便鐵道設置、糖業鐵道的鋪設、縱貫線鐵道的建設等改善臺灣的交通後，旅客人數與旅遊業者又再增多，特別是在1908年縱貫線鐵道於4月18日開始試駛，並於4月20日全線通車，除了使得臺灣南北交通更便利外，也促使旅遊業與旅客的蓬勃發展，而旅客的增加又再促使介紹旅遊以及景點介紹的書籍出版，如1916年由橋本白水所著《臺灣旅行案內》，除了對當時臺灣的歷史與發展沿革進行大略的介紹外，也列出了火車時刻表以及介紹了各個火車站周邊的景色，如書中推薦當時的臺中火車站的周邊景點便是臺中公園。^[24]

上述《臺灣名所寫真帖》、《臺灣旅行案內》以及其他以今日的眼光屬於「旅遊類」的書籍，這類書籍本意是推銷臺灣各地的名勝古蹟，讓人想要了解該地區的發展沿革以及現今的狀況等。此外隨著旅遊的人數增加，想要了解更多的旅遊資訊與景點的歷

史，也讓這類書籍的內容變得豐富，若以1899年出版的《臺灣名所寫真帖》做為比較，該書有關交通說明及臺灣景點的介紹內容大約26頁，然而在1916年出版的《臺灣旅行案內》交通說明及臺灣景點的介紹內卻多達200多頁，其中因素除了交通的選擇介紹以及時刻表、票價說明的增加外，還有旅遊景點的增加以及介紹增多。

同一時間出版的許多書籍有別於《臺灣名所寫真帖》或是《臺灣旅行案內》書籍，這些介紹或是記載臺灣產業的相關資料，類似於臺灣歷史介紹書籍，書籍中同樣也會介紹許多名勝古蹟，但書中的內容闡述的重點並不是在如何到達與交通方式，如1915年出版由武內貞義編寫《臺灣》一書，當中便介紹了臺灣的發展通史，從明朝以前臺灣史介紹到清朝統治結束，此外更詳細了解說歷史人物，如濱田彌兵衛、朱成功（即鄭成功）等，^[25]並且針對臺灣的風土民情進行介紹，是當時日本人要來了解臺灣的重要書籍。然而該書針對臺灣旅行的說明，則編排在書尾附錄〈臺灣旅行案內〉的章節中，介紹的交通方式的篇幅占比較少，顯示該書的介紹重點不在臺灣的旅行說明。

又如由臺灣總督府編，於1916年10月創刊的《臺灣事情》，刊物內容針對當時的土木建築、水道工程、農林水工業等進行介紹與統計，該書中分類的章節有土地、氣象、戶口、政務機關、法制、交通及通信、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業、貿易及金融等。另外針對臺灣的古蹟名勝以及主要的街區發展進行論述，如《臺灣事情（大正五年十月創刊）》在第一章〈土地〉中，除了記載各地的土地耕作面積外，也介紹了各地主要的街區，相關的名勝古蹟如八卦山、赤崁樓等，^[26]主要目的便是要讓當時的讀者了解當地，然而已經有其他介紹交通方式的書籍，如此該刊物介紹的重點便需要對旅行方式加以說明。

此一時期也有出版單純介紹古蹟名勝書籍，同樣也是因為有其他論述交通的書籍，書中內容便沒有針對交通介紹，如1916年由杉山靖憲撰寫的《臺灣名勝舊蹟誌》，書中內容沒有交通說明以及時刻表，而是著重介紹當時臺灣的景點與古建築，其中當時的臺中廳被該書選入的名勝舊蹟有臺灣府城址、臺中公園、國姓井、彰化城址、彰化文廟、白沙書院、八卦山、太極亭、彰化公園、定光廟、慶安宮、威惠宮、開化寺、虎山巖、清水巖、大肚御遺跡、龍目井、鹿仔港、天后宮。^[27]又如1925年由山川朝章撰寫的《臺灣風景寫真帖》，這本書有別於以往觀光景點介紹書籍，也沒有交通說明以及時刻表等做為交通參考，主要是在介紹全臺灣各地的著名建築與景觀，其中該書選中臺中市內的名勝古蹟則是臺中公園以及臺中神社，當時的臺中神社等級為縣社，並且還供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28]這顯示了在日治時期除了有專門撰寫地方學研究的書籍外，對於名勝古蹟的專門介紹也是當時地方書籍出版的趨勢。

在1920年7月1日「臺灣州制公布（律令第三號）」頒布，內容為臺灣將要施行州制並於1920年10月1日開始實施，^[29]而臺中廳、南投廳、彰化廳合併成臺中州，除此之外也成立臺中市，這段時間內便有不少的有關臺中市歷史介紹的書籍出版，其中1921年由田中一二編著《臺灣事情之宣傳》，此書介紹了臺灣的介紹了臺灣歷史、古蹟與名勝外，還針對了臺灣的風俗民情、教育、工農林業進行統計與介紹，其中分類介紹了方法便以各州與各市在每個項目中分類介紹，因此在該書的序文中，還有當時的臺中市尹川

中子安治郎的序文，序文中除了介紹臺灣地方制度的發展外也讚揚了地方制度的完善。^[30]另外像1922年出版的《臺灣事情 大正十年版》中，其中有關古蹟名勝的相關介紹開始區分為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與花蓮港廳的介紹，^[31]而會有這樣的改變便是地方制度的改變。

此外針對臺中州地區的介紹與相關統計的書籍出版，如1922年由泉風浪著的《臺中州大觀》出版，而撰寫《臺中州大觀》時泉風浪任職於臺灣新聞社，並擔任《臺灣新聞》記者，^[32]因此對於臺中州有所了解，該書便對臺中州地區有了詳實介紹，並針對了臺中州地區的財政、交通、土木、宗教、社寺、教育、產業、金融、貿易進行介紹。另外該書的特點除了增加廣告頁外，還有不少當時臺中州內的商店與旅店介紹，如在該書〈繁昌する 商店と旅館〉的章節中，介紹了臺中卸商同志會、前田回春堂、臺中物產商會、大野新三郎式、三共社、相の浦鐵工廠、河村商會、佐藤濟生堂藥局、臺中軒、中央藥房、中部水販賣組合、佐竹商店、清水雜貨店、貴田商店、愛月館、埔里街桶谷商店、丸三大藥房。^[33]

但書中所選的商店與旅店沒有一定的評判標準，又有許多同一時期的重要旅店與商家沒有選入該書，如臺中市內的醉月樓、富貴亭等店家沒有收錄到該書中，因此筆者懷疑該書對於部分店家進行了「業配」，也就是讓這些店家贊助本書的出版，才會獲得該書的介紹。主要因素為該書出版依靠民間出版社，由臺北的南國出版協會以及臺中自治公論社出版，因此需要有獲利來源。不過就是這些店家有贊助該書出版，使得這些店家成為日後研究中部店家與旅店的重要資料。

另外《臺中州大觀》最為可貴的便是針對臺中州內政府官員以及仕紳名流的介紹，如在該書該節中〈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一 官僚の面〉中，除了有知事常吉德壽的介紹外，也有如內務部長本山文平、警務部長本間善庫、土木課長岩淵恕、勸業課商工係長村上壽作等人的生平介紹，^[34]並提供了臺中州官員的相關資料，此外也有臺中州下轄的郡守以及市尹，如臺中市尹川中子安治郎等人的生平介紹。^[35]而有關民間的仕紳名流則在該書〈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二 民間の面々〉中，主要介紹了人物除了有企業家，還有醫師、律師、會計師等人物，有彰銀專務代議士坂本素魯哉、北屯庄會計役賴進登、北斗街醫師吳海瑞、教員與辯護士葉清耀等人。^[36]但同樣書中對於民間所選的人物沒有一定的評判標準，如身價、開設公司的數量等，又如林獻堂、吳子瑜、楊肇嘉等同一時期中部地區的著名仕紳沒有入選。因此筆者也懷疑該書對於部分人物進行業配，也就是讓這些人物贊助本書的出版才有收錄到該書中，不過也因為該書介紹了這些人，讓日後研究臺中州地區中產階級人物的重要資料。

如此《臺中州大觀》成為研究日治時期中期臺中州地區發展，還有店家、人物的重要書籍，另外在該書的編排方式與章節安排上條列分明，後來於1923年高雄州廳編寫定出版的《高雄州大觀》也採用這樣的編排方式，將土地、氣象、戶口、行政、交通、水利、產業等設為章節並分列論述，還增加了史蹟及名勝古蹟，介紹了人物如鄭成功、鄭經等，以及民變如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等，也介紹了名勝古蹟如滾水山、大岡山、半屏山等，還有古蹟如鳳山城址、鳳儀書院、曹公祠等共計33項。^[37]

至於《臺中州大觀》與《高雄州大觀》這兩本書的章節安排與目次，都可以發現到具有現今鄉鎮市志的雛型，雖然《高雄州大觀》在內容量沒有《臺中州大觀》多，但在章節的編排與分類上卻更加明確，如區分了土地、氣象、戶口等章節，產業也區分為農業、林業、糖業、礦業等，如參考下表格整理：

表2

《臺中州大觀》與《高雄州大觀》的頁數與章節安排比較

《臺中州大觀》	《高雄州大觀》
總頁數：368頁	總頁數：273頁
一 臺中州の現状 二 財政、交通、土木 三 警察、理蕃、衛生 四 社會事業の概況 五 宗教、社寺、教育 六 產業、金融、貿易 七 臺中州の專業界 八 繁昌する商店と旅館 九 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一 官僚の面々 十 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二 民間の面々 十一 臺中州統計便覽	第一章 土地 第二章 氣象 第三章 戶口 第四章 行政 第五章 交通及び土木 第六章 水利 第七章 農業 第八章 畜產 第九章 糖業 第十章 林業 第十一章 水産業 第十二章 鑛業 第十三章 工業 第十四章 商業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兵事 第十七章 神社及び宗教 第十八章 社會事業

第十九章 民事爭訟調停
第二十章 警察
第二十一章 衛生
第二十二章 財政
第二十三章 史蹟及び名勝古蹟

參考資料：泉風浪，〈臺中州大觀〉（臺北：南國出版協會；臺中：自治公論社，1922年）；高雄州廳編，〈高雄州大觀〉（高雄：高雄州廳，1923年）。

參、臺中市史的出版過程與相關書籍發展

在《臺中市史》出版之前有關臺中市自己的地方介紹與相關書籍，則有臺中市役所編著的《臺中市管概況》，其中所論述了除了介紹臺中市的當前規劃、歷史沿革外，還針對當時臺中市內的土地、氣象、戶口、神社及宗教、教育、社會教育、社會事業、衛生、市場、產業、交通及土木、財政等進行分類統計與介紹，是當時了解臺中市的重要資料，如在《大正十三年 臺中市管內概況》中，相關的臺中市氣象資料從大正4年度（1915）提供到大正13年度（1924），其中氣象資料則細分成氣溫、氣壓、濕度、風速、總雨量、天候及地震次數。^[38]成為研究臺中各方面重要的資料來源。

另外此一時期城市內的景點觀光也蓬勃發展，其中針對臺中市內景點內的刊物地圖則也有出版，如由金子常光編著的《臺中市要覽》中，除了介紹臺中市的發展沿革，並擺入如《臺中鳥瞰圖》之類的手繪地圖外，更選擇臺中市內的著名景點進行介紹，被選入的名勝古蹟與重要建築，有臺中神社、臺中公園、綠川、行啟紀念館、芭蕉市場、湧泉閣、第一消費市場、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北門樓、市營娛樂館、水泳場（即游泳池）、公會堂、臺中分屯大隊、市民館、臺中驛等，並且介紹如新勝橋通等臺中市內的繁榮街道。^[39]成為當時臺中市內重要的觀光導覽刊物也具有地方學價值。

而對於臺中市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地方學書籍便是《臺中市史》，但早在《臺中市史》出版以前臺灣便有市史已經出版，如1931年出版由臺灣通信社社長田中一二著的《臺北市史》，該書的編寫初衷便是在臺北市設市10年後可以有一本關於臺北市的歷史沿革與發展的地方志書，其中的內容便是針對街道的建設與發展以及臺北市內著名的店家介紹，此外還有臺北市內的產業相關產值統計等以及臺北市內的名勝與重要建築，成為日後研究臺北市的重要資料。其中耐人尋味的是臺南市史、臺中市史、基隆市史、新竹市史、嘉義市史、高雄市史在《臺北市史》的廣告中刊登出版訊息。^[40]然而最終的結果是這些「市史」在日後各市都還在進行招募或徵詢編撰委員的階段，便因中日戰爭爆發等因素而中止，而後來出版的《臺中市史》也並不是由臺灣通信社所出版。

《臺中市史》的從召集到編排再到出版耗費了7年的時間，其中針對當時市史資料的調查費編列為五百餘圓，並於1927年6月22日於臺中市役所開設第一次的編撰會議，^[41]由當時的臺中市尹遠藤所六召集《臺中市史》編纂委員，並由市內各小學校、公學校校長以及地理、歷史老師來擔任。^[42]其中編撰委員由時任臺中師範學校教諭的氏平要，^[43]來擔任《臺中市史》編撰委員主查，其他委員則有高濱利久、野末誠一、田村勉、田中米藏、安部英喜、洲濱文太郎、荒木三郎、大山正名、杉本主二、小野一郎、肥後杉雄、長井實一、小川滋、吉田作太郎、加藤虎太郎、赤木虎雄、高澤三平、石垣孫保、本島信重、謝宗賢、西川政藏、內田賢吉、邱雲艷、黃腹、角田哲雄、渡邊壽倉、星萬壽雄、北橋千代作等19位組成編纂委員，^[44]來擬定了編纂大綱以及古書紀錄查閱傳說與新聞收集等。

《臺中市史》的撰寫便緊鑼密鼓的進行，1927年7月15日召開《臺中市史》編撰會議，由曾任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內務局文教課囑託尾崎秀真來，講述《臺中市史》的編撰概要。^[45]《臺中市史》編撰委員會又於1927年8月22日召開，主要便是要調查臺中州的古文書、收集相關資料等，並且擬定訪問臺中耆老等計畫。^[46]在1927年12月8日又召開在編撰會議，除了進行相關的磋商並由各委員報告資料收集的進度，以及之後要調查的事項等。^[47]在《臺中市史》大略撰寫完成後在1931年8月至1932年2月期間，則是由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猪口安喜、^[48]中袴田雄吉等人進行校閱，校閱完成後還交由各級機關進行修訂。^[49]如此前後經歷了五任臺中市尹的《臺中市史》，最終由臺灣新聞社出版成書。

也因為有許多專業的編輯委員，《臺中市史》在章節目次上的編排分類，資料的多樣性上好於《臺北市史》，其中除了介紹臺中的沿革概要外，還有臺中市內的氣象、人口、財務等統計資料，也區分出統治機關、官治、軍事、司法、警察、衛生、土木行政等章節。如此將日治時期臺中市的歷史資料與相關統計彙整分類，細小到如臺中車站的載客量、進出貨統計，銀行與組合機關的財務統計等，成為日治時期最完整的市史，如《臺中市史》在與《臺北市史》的比較中，除了內容量更多外，在章節的編排上也更為明確，參考下表中便是《臺北市史》與《臺中市史》在章節編排上的比較：

表3

《臺中市史》與《臺北市史》頁數與章節目次比較

《臺中市史》	《臺北市史》
總頁數：744頁	總頁數：716頁

序
緒言
臺中市史編纂關係者
目次

第一編總說

第一章臺灣の沿革概要
第二章臺中の天然地理
第三章氣象
第四章臺中建置
第五章臺中發達の概觀

第二編統治機關

第一章官治
第二章軍事
第三章司法
第四章警察
第五章教育
第六章衛生
第七章土木行政
第八章交通
第九章勸業
第十章臺中測候所
第十一章官公私立醫院

第三編財務行政

第四編民族

第一章人口
第二章風俗習慣

總督諭告

序

目次

歴史が語る臺北の今昔
臺北平野の開拓と艋舺の殷賑
淡水河の水流と大稻埕の建街
城内の出現と附近の村落二三
領臺後の臺北と文明都市建設
市制の實施と出現した臺北市
繁榮する臺北の鳥瞰圖
昔の臺北三市街と臺北の市内
昔の臺北三市街と臺北の市内
市内を装ふ大小の道路と街觀
市内を装ふ大小の道路と街觀
街觀美の建物と内臺人の住宅
交通機關とスピード時代出現
大小公園と散策地と涼み場所
臺北の進展振と各世相
島治の中樞地臺北市とお役人
島治の中樞地臺北市とお役
活動する新聞雜誌界と筆の人
臺北の公共團體と社交の團體
商業地の臺北市と臺北の商店
商業地の臺北市と臺北の商店
誇り得べき公設市場と行商人
産業上より觀た臺北市
臺北市の産業界とその生産額
市内の耕地と農業及び畜産業
臺北市の工業地帯と家内工業
市内に於ける鑛業及び水産業

第五編社會事業
第一章保護救濟
第二章風教上の施設

第六編神社及宗教
第一章神社及社
第二章宗教

第七編口碑傳說遺蹟
版權頁

各種の副業と労働者及び勞銀
臺北の衛生保安と軍隊
臺北市の衛生施設と保健設備
市の警察と消防と罹災民救助
島を守備する軍隊と臺北市民
臺北の學界と運動競技
進展を示した教育界と向學心
完備した教育機關と研究機關
向上した讀書熱と趣味と研究
講演會座談會とラヂオの放送
旺盛時代を示す臺北の運動界
臺北の治政と市の出現
治政の沿革概要と臺北三市街
臺北市の市政運用と市の諸機關
伸展する臺北市勢と市の財政
昔の都市計畫と將來の改正案
歴代の市尹と助役のその功績
風俗の變遷と臺北名勝
臺北の名勝舊蹟地と臺北名物
生活風俗の變遷と臺北人
臺北の社會事業と細民の生活
臺北の享樂境と柳暗花明の巷
臺北市十一年略史
臺北市現勢一覽

參考資料：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田中一二，《臺北市史》。

因此可以發現到《臺中市史》在地方官修主導下，成為臺中市日治時期重要的歷史資料，在《臺中市史》出版以後臺中市也還是不斷出版相關的地方歷史研究與相關統計資料，如臺中市役所編的《臺中市管內概況》便持續出版。也因為《臺中市史》正好在

中日戰爭爆發前出版，沒有因為戰爭等因素使得市史編撰計畫無疾而終，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最完整的市史。

肆、結論

回顧日治時期有關臺中的地方志書發展，便發現與臺中的志書尚未發展以前，有關臺中的書籍的發展模式從原先的簡單介紹並且著重於旅遊交通方式解說的書籍，增加了以介紹當地名勝古蹟為重，交通與旅遊說明為輔的書籍，顯示這些旅遊類書籍的導向，從原來的吸引日本人來到臺灣變成讓日本人能夠更深入瞭解臺灣。

之後出版的書籍還出現了專門介紹名勝古蹟而忽略了交通方式介紹的書籍，顯示了除了讓日本人認識臺灣外，讓在臺日本人更加了解臺灣，此外會增加有關產業發展歷史沿革，以及刊載了有關土地、氣象、戶口等統計資料，這類書籍的發展除了讓人了解臺灣外，也便是要展示臺灣的發展，並提供日後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漸漸有了現代志書的雛型，如此這段時期的地方書籍的發展以及臺中志書的發展如下方系譜圖：

1896年 出版臺灣歷史、旅遊介紹書籍

《史蹟名勝調查
報告書》、《臺
灣名所寫真帖》

1916年 具地方發展沿革與統計資料的書籍

《臺灣事情》、
《臺灣事情之宣
傳》

1922年 以「州」為核心的志書出版

《臺中州大觀》、
《高雄州大觀》

1931年
地方市史出版

《臺北市史》、
《臺中市史》

圖1 日治時期有關臺中地方書籍、志書的發展系譜圖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這些統計資料，也出現了「地方化」的趨勢，從原先臺灣總督府主導的統計書籍中分割出來，由地方政府或是民間來統整編排有關該地區的統計資料，如文中論述的《臺中市管內概況》，便是讓地方政府了解到地方產業、人口等從日治初期到當時的發展，有了施政參考。另外在臺中市役所撥款500圓進行史料調查，最終於1934年出版的《臺中市史》則是將臺中市內的相關統計資料、歷史沿革發展集成，除了讓當權者了解到臺中市的發展與歷史外，也作為展示讓民間了解地方政府的施政成果。

可以了解到日治時期有關地方介紹的書籍，從原先的旅遊導覽增加了景點介紹，甚至脫離旅遊導覽性質的書籍增加了專注介紹名勝古蹟的書籍，之後這類介紹名勝古蹟的書籍又轉變為從事地方研究書籍，也從僅介紹名勝古蹟與地方歷史增加了富含地方的統計資料，並且將這些地方統計資料加以彙整編排，並對產業發展與地方沿革進行論述，才有了今日地方志書格式與雛形。

《臺中市史》在後世對於臺中地學研究書籍中影響，所用到該書的資料便相當多，如陳靜寬著《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1895-1945）》中，介紹了臺中市的市區規劃以及街區地貌改變等，這些日治時期的資料便參考了《臺中市史》。^[50]如朱書漢著《驛動軌迹：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書中介紹了臺中火車站的歷史，其中有日治時期臺中火車站的載客量資料，以及臺中糖業鐵路中南線等資料就引用《臺中市史》。^[51]另外在游博清著《市街之味：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中有關日治時期臺中市場的相關歷史沿革發展，統計資料等也都引用《臺中市史》。^[52]可說有關臺中地方學研究的書籍中，都或多或少參考了該書的資料。

因此從本研究中了解到《臺中市史》出版前，地方志書的發展脈絡與《臺中市史》在日治時期地方志書的地位，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地方志書的標竿！

參考書目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編纂委員協議〉，《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7年6月22日。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編纂員會集〉，《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7年7月16日。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編纂磋商〉，《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7年8月25日。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昨日編纂委員會議〉，《臺灣日日新報》2版，1927年12月9日。

山川朝章，《臺灣風景寫真帖》，臺北：統計時報社，1925年。

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 手稿本》，臺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1934年。

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年。

田中一二，《臺北市史》，臺北：臺灣通信社，1931年。

田中一二，《臺灣事情之宣傳》，臺北：新臺灣社，1921年。

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臺北：臺灣商報社，1899年。

朱書漢等，《驛動軌迹：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17年。

尾崎秀真等，《史蹟名勝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典藏，1896年。

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年。

武內貞義編寫，《臺灣》，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5年。

金子常光，《臺中市要覽》，臺中：臺中市役所，1934年。

泉風浪，《臺中州大觀》，臺北：南國出版協會；臺中：自治公論社，1922年。

高雄州廳編，《高雄州大觀》，高雄：高雄州廳，1923年。

張勝彥等，《臺中市史》，臺中：臺中市文化中心，1999年。

張勝彥總編，《臺中縣志》，臺中：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2010年。

郭佳玲，《台日地方史志纂修的比較研究——以新修之《台中市志》與《山口縣史》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陳靜瑜等，《臺中市志》，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8年。

陳靜寬，〈《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1895～194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年。

游博清，〈《市街之味：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17年。

臺中市役所，〈《大正十三年 臺中市管概況》〉，臺中：臺中市役所，1925年。

臺灣總督府編，〈《大正十五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26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大正五年十月創刊）》〉，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 大正十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年。

蔡秀美，〈1917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東京：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17年度第2回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活動「研究報告書」，2017年。

蔡蕙頻，〈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以泉風浪著作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年9月），頁493-520。

橋本白水，〈《臺灣旅行案內》〉，出版地不詳，1916年。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904年。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1] 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 手稿本》〉（臺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1934年）。

[2] 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臺北：臺灣商報社，1899年）。

[3] 橋本白水，〈《臺灣旅行案內》〉（出版地不詳，1916年）。

[4] 武內貞義編寫，〈《臺灣》〉（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5年）。

[5]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大正五年十月創刊）》〉（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年）。

[6] 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年）。

[7] 山川朝章，〈《臺灣風景寫真帖》〉（臺北：統計時報社，1925年）。

[8] 田中一二，〈《臺灣事情之宣傳》〉（臺北：新臺灣社，1921年）。

[9] 泉風浪，〈《臺中州大觀》〉（臺北：南國出版協會；臺中：自治公論社，1922年）。

[10] 臺中市役所，〈《大正十三年 臺中市管概況》〉（臺中：臺中市役所，1925年）。

- [11]金子常光，《臺中市要覽》（臺中：臺中市役所，1934年）。
- [12]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年）。
- [13]張勝彥等，《臺中市史》（臺中：臺中市文化中心，1999年）。
- [14]陳靜瑜等，《臺中市志》（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8年）。
- [15]張勝彥總編，《臺中縣志》（臺中：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2010年）。
- [16]蔡秀美，〈1917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東京：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17年度第2回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活動「研究報告書」）。
- [17]蔡蕙頻，〈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以泉風浪著作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年9月），頁493-520。
- [18]郭佳玲，《台日地方史志纂修的比較研究——以新修之《台中市志》與《山口縣史》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 [19]尾崎秀真等，《史蹟名勝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典藏，1896年），頁1-10。
- [20]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封面後21頁。
- [21]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頁40-53。
- [22]為臺灣日治初期的街區名稱，今大致範圍為臺中市中區柳川里、大墩里、光復里、公園里、繼光里。參考自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904年。
- [23]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頁45。
- [24]橋本白水，《臺灣旅行案内》，頁107。
- [25]武內貞義編寫，《臺灣》，頁71-81。
- [26]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大正五年十月創刊）》，頁1-22。
- [27]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頁408-448。
- [28]山川朝章，《臺灣風景寫真帖》，頁5。
- [29]「臺灣州制公布（律令第三號）」（1920-07-01），〈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006010。
- [30]田中一二，《臺灣事情之宣傳》，頁6。
- [31]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 大正十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年），頁21-49。
- [32]蔡蕙頻，〈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以泉風浪著作為中心〉，頁502。
- [33]泉風浪，〈繁昌する 商店と旅館〉，《臺中州大觀》，頁3-20。
- [34]泉風浪，〈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一 官僚の面〉，《臺中州大觀》，頁3-20。
- [35]泉風浪，〈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一 官僚の面〉，頁34-35。

- [36] 泉風浪，〈臺中人物評判記 その二 民間の面々〉，《臺中州大觀》，頁1-77。
- [37] 高雄州廳編，《高雄州大觀》（高雄：高雄州廳，1923年），頁231-252。
- [38] 臺中市役所，《大正十三年 臺中市管概況》，頁6-14。
- [39] 金子常光，《臺中市要覽》，頁3。
- [40] 田中一二，《臺北市史》（臺北：臺灣通信社，1931年），廣告頁。
- [41]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編纂委員協議〉，《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7年6月22日。
- [42] 郭佳玲，《台日地方史志纂修的比較研究——以新修之《台中市志》與《山口縣史》為例》，頁109-110。
- [43] 臺灣總督府編，《大正十五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26年），頁183。
- [44] 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目次前10頁。
- [45]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編纂員會集〉，《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7年7月16日。
- [46]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編纂磋商〉，《臺灣日日新報》4版，1927年8月25日。
- [47] 不著編撰人，〈臺中市史 昨日編纂委員會會議〉，《臺灣日日新報》2版，1927年12月9日。
- [48] 臺灣總督府編，《昭和六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年），頁86、100、134。
- [49] 氏平要等編，〈序〉，《臺中市史》。
- [50] 陳靜寬，《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1895～194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年）。
- [51] 朱書漢等，《驛動軌迹：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17年）。
- [52] 游博清，《市街之味：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17年）。

「國世」與興趣： 方豪的臺灣史研究

徐維里*

摘要

方豪是20世紀史料學派的代表性史家之一。出身杭州，早年便投入神職的他，在宋史、天主教史、中西交流史研究饒有建樹。他的臺灣史研究雖從來臺後方才啟程，也迅速發展出對臺灣文獻保存與推廣的見解，並且終身都著力於推進以史料為本的專題研究，以求深化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的理解。方豪主張中國作為「祖國」的角色，建立臺灣與中國的連結，以及彰顯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但也強調臺灣本省人寫本省史的重要性；以此之故，儘管亦了解其限制，出身臺灣的連橫《臺灣通史》是方豪推重的臺灣史著作，一生為之解說、補充。方豪對於臺灣方志文獻的編集、校勘、審定以及出版皆很重視，其中有史學家的視野，也有不願讓日本的臺灣史研究專美於前，出自民族氣節之堅持。方豪且認為臺灣史就是一部民族運動反抗史，經過長年一系列的專題研究準備後，也曾在晚年構思著手書寫一部立基於自身學術研究與史觀的臺灣通史。方豪不吝於以新出史料增補乃至改動自己過去的研究，為的是建立更完備的史學研究，對推動臺灣史研究與包括臺灣在內的「國世」之研究與歷史教育不遺餘力，依據史料文獻的概況與潛力，說明認識史料文獻與建立「興趣」的重要性。此作法在方豪的臺灣史研究進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關鍵字：方豪、連橫、《臺灣通史》、民族思想、歷史教育

壹、前言

出身浙江杭州，早年便踏上神職之路的方豪（1910-1980）神父終生耕耘歷史研究，在天主教史、中西交流史、宋史以及臺灣史等研究領域皆有重要乃至奠基性的貢獻。方豪擅長透過發掘史料產生研究課題，處處留心，下筆尤快，以研究諸課題而觀，也可以說是跨領域研究的先聲。這個特色在方豪的臺灣史研究尤其明顯。^[1]

有關方豪在臺灣史研究的貢獻，已有許多研究。有關他的生平，作為神父、學者的形象，李東華是最重要的學者。除了編集

《方豪年譜》以外，李東華也整理了方豪著作，並針對方豪的民國學術網絡，以及方豪與天主教的關係有諸多專篇文章研究。^[2]至於專注於方豪與其臺灣史研究，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可為代表。該文介紹方豪的教研工作，特別是著重於他對臺灣史料的介紹與校訂，以及對臺灣史上的人物、宗教，以及晚年對商業同業工會「郊」的專題研究；^[3]盧胡彬〈方豪對臺灣方志研究的貢獻〉則集中探討方豪研究方志或者整理方志的活動，認為方豪在介紹、編輯、版本與修纂方志上都作出重大貢獻；^[4]洪健榮〈開啟「典範」的先驅：方豪對清代臺灣方志的研究〉則以樹立「典範」的角度，推崇方豪對清代臺灣方志研究的開創性成就。^[5]前人研究對於方豪的生平和轉向臺灣史研究的歷程以及貢獻都已有甚多著墨，本文不擬細述，只想從方豪對臺灣史研究如何觀察、親身參與的過程，並從學者方豪的角度，探討他投身臺灣史研究的準備與心得，和他對未來研究可能的構想與建議，如何與如今臺灣史研究進程互相參照。

由於出身背景與時空關係，方豪再三強調的是中國作為臺灣之「祖國」的關係；但他也認為本省人寫本土史有其重要性，因此推重臺人連橫《臺灣通史》，並終生為之辯護。方豪認為學術發表園地在戰後的萎縮、地域主義，以及學風的不變，是臺灣史研究由盛轉衰的原因。方豪主張帶有批判意識地參照今昔日本學者的研究業績，以帶民族思想的歷史教育重塑「國世」（國家的身世），並基於材料，撰寫適合「各等人」閱讀的教科書，同時激發學子們研究「本國史」的興趣。方豪的一系列臺灣史研究，便是在他眼中無限待發掘材料引發的研究興趣下所產出的結果，可說是方豪史學的展示。來臺後長年的系列專題研究成果，是方豪準備撰寫新臺灣通史的基礎，可惜在他生前，本書並未得以順利成書、付梓面世。但方豪對臺灣史的探索，不僅開展了戰後臺灣史研究的進路，也預見了推廣認識臺灣的種種途徑的重要性，並對臺灣史研究大眾化的有效性，作出初步的嘗試。立足於對前人研究以及新舊史料的認識上，方豪不僅是實踐上，也是理論上的先鋒，推進了臺灣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貳、對臺灣史研究的探索、觀察與建議

方豪的臺灣史研究幾乎可說是和他來臺以後的職涯同步展開。由方豪的著作目錄來看，他在生前的研究重心也轉向臺灣史研究（特別是臺灣方志），或應用臺灣史料進行中西交流史研究為主，演講也以推廣臺灣史研究者為多。方豪來到臺灣的機緣始於1948年6月。他正好結束了在北平上智編譯館館長職，並收到江西、四川等地大學的招聘邀請，本來想應聘入川，到四川大學任教，但為胡適（1891-1962）極力勸阻，認為北方情勢不穩，應該入臺才是正途。^[6]這是方豪人生的一個轉捩點。1949年1月，方豪受傅斯年（1896-1950）邀請，於2月從上海登船，經高雄來到臺北，應聘臺灣大學歷史系，先後開設「中西交流史」、「中日關係史」、「宋史」等課程。^[7]晚年也開設「臺灣史專題研究」等課程。這可顯示方豪在學術與教學興趣上的轉變。方豪自初來臺灣，即熱心於搜集臺灣史料，不僅曾在連震東（1904-1986）家閱讀連橫（雅堂，1878-1936）所藏文獻，也數次前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在楊梅）閱讀材料。臺大教授楊雲萍（1906-2000）曾在《臺灣風土》（1941）發表過研究臺灣的10本必讀書目，成為方豪入門臺灣史研究的閱讀書單。^[8]同時，因地近之利，方豪每日隨臺大文學院同事陳紹馨（1906-1966）教授讀書，正式開啟他對臺

灣史研究的學術訓練，當年8月，方豪便發表〈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又在10月發表〈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此二篇論文為方豪研究臺灣史的起點。隔年1月，方豪在史語所發現《恆春縣志》。此為他筆下的「臺灣史研究之大事」，很快便發表〈《恆春縣志》的發現〉。1960年，方豪除了在木柵溝子口（今考試院附近）講道，同時仍在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並借聘政大文理學院院長，終於在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方豪自從來臺後，便特別關心臺灣史料文獻的介紹、校訂，以及專題研究。在累積出一定成果以後，方豪在教職的晚期也依據臺灣史料開課，並且持續發表論文或雜文，推廣臺灣史研究。早在發表數篇臺灣史著作之後，方豪就曾在1949年12月應邀到臺灣文化協進會發表講座〈臺灣文獻的散佚與今日的迫切工作〉。方豪在演講中指出臺灣文獻的缺點在於變亂太多（直接導致文物摧毀）、蟲害太大（文物長期保存不易），使得史料文獻散佚甚多。此外，臺灣文獻出於他省人之手者太多，缺乏本省人的觀點。^[9]因此方豪建議應該趕緊：一、培養能夠整理並研究臺灣文獻的人才，主張成立「臺灣文化研究所」；二、組織對臺灣史以及臺灣文獻感興趣的人士，組成小團體，舉辦座談會、演講、展覽，以及發行會刊；三、因應不同的閱聽人，編印叢書。如已故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臺灣先哲叢書」、整理或翻譯專書或論文集組成的「臺灣研究叢書」、給一般讀者閱讀的「臺灣百科叢書」，激發讀者對臺灣的注意；四、籌備屬於臺灣的全省文獻展覽會。方豪從戰前浙江省與蘇州的展覽會得到靈感，目標是在時局穩定以後，舉辦規模更大的文獻展覽會，舉行演講，並在會後編印出版目錄。^[10]這些都是方豪認為可以有效保存並推廣臺灣史料文獻與臺灣研究的方法。

這篇演講稿很像是方豪來臺將近一年的臺灣史研究成果報告書，展現的是方豪過去的史學訓練，以及對臺灣文獻展開整理研究後數個月內的發現。可見方豪很早便指出很多人在看待臺灣及其文獻上的謬誤，認為臺灣不僅小，而且歷史偏短；但實際這些文獻的內容並不貧乏，而且可供研究的史實很多，待解決的問題也不少。有關史料保存，日本人是功勞的。在中國本土文獻史料因為缺乏新史學知識而遭到忽視之時，日本19世紀末期在東京帝國大學成立史學科，移植現代西洋史學研究法。因此對臺灣的歷史研究，包含搜求、整理、保管和研究，皆由日人包辦。^[11]方豪肯定日人在整理和輯佚的貢獻，但認為日人的臺灣史在研究上是「罪浮於功」：一是為日軍侵略行為服務的學術，一是對文獻的誤讀、誤印等。這些是方豪極早就發展出來的定見，爾後他對日本學者的持續批判，以及他自身的臺灣史研究之學術業績，基本上都在證明以強調此一早年的觀察，幾乎未曾改變。^[12]

將近30年後，方豪在〈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主題演講中觸及了多個主題，除了介紹臺灣的臺灣史研究概況以及興衰之外，更像是方豪個人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對學界的建議。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方豪的臺灣史研究中仍流露著濃厚的中國作為「祖國」本位角度，但方豪對於「臺灣人」研究的「臺灣史」亦有所認識，並不將「中國」角度的臺灣史視為唯一正確的視角。

參、方豪的「祖國」意識

在1951年完成《臺灣民族運動小史》之際，方豪來臺尚未滿兩年半，便已撰就至少13篇臺灣史研究專文以及校訂出版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作為建議有興趣就相關議題作進一步閱讀的讀者的參考書目。據方豪在凡例中所云，《臺灣民族運動小史》的出版有其時空背景，乃「受友人委託」，且「勉強交卷」；雖「稍有獨到之處」，但方豪還是坦言自己並不擅長通史性質著述，對專題研究「比較習慣」。^[13]這也許是方豪的自謙之詞，但若細讀《臺灣民族運動小史》，該書無疑的是以中國作為臺灣「祖國」的角度出發，目的或是為在光復後、國民政府遷臺後不穩定的政治情勢間降低省籍衝突，試圖增加潛在臺灣讀者對中國的向心力，而強調「驅荷」、「反清」、「抗日」的著名事例。所謂「獨到之處」，其例證之一或許是方豪善用了當時較少學者使用的荷蘭史料，例如從《巴達維亞城日誌》中發現臺民發動的一些民族運動。按所引事例，多半是土人（平埔族原住民）因為「中國人的煽動」而叛亂。在荷蘭時期晚期，郭懷一的抗荷則因為漢人社商欺負山地同胞，多達2000人的原住民反而加入荷蘭人勢力，郭懷一的民族運動因而潰敗。郭懷一的事蹟日後雖然在中國書上亦有所記載，但和荷蘭史料內容角度相去甚多，而且出版年也晚於荷蘭文獻數十年。

方豪在文間多處也充滿同情，認為臺灣人發起的民族運動以及知識基礎有其時代背景，源自「精神上的苦悶」。時空的限制使得臺胞無暇精挑細選值得追隨的主義，因此「是很應該寄以同情而加以原諒的」。^[14]

在筆尖常帶「祖國」與「民族」思想情懷的方豪，至少有幾篇文章強調臺灣人對大陸的懷念，如〈臺灣詩人對大陸的懷念〉。對滿清割臺一事，又有〈詩人筆下的臺灣淪陷〉，^[15]以及〈從「櫟社詩集」見臺灣詩人之民族精神〉。^[16]有關臺人抗日，也有〈臺灣在政治上與文化上抗日的回顧〉等文。^[17]這顯示著方豪特別留意臺海兩岸詩人及其文學所彰顯的意識甚或思想，及其在特殊時空下的歷史意義。這方面又可以方豪對連橫《臺灣通史》的重視為代表。

方豪對於如今經常受到挑戰的連橫《臺灣通史》，是帶著比較同情地理解的角度予以評價。其實《臺灣通史》甫出版就受到當時中國大陸讀者的批評，說是該書的編法是「舊眼光、舊方法」，加上連橫不諳西文，在臺外關係上謬誤甚多，且對割讓事也隻字未提。^[18]方豪的〈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旨在為連橫平反；進而，最重要的是發揚連橫筆下在〈風俗志序〉驚天地泣鬼神的「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19]方豪強調連橫的民族思想，在〈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提到連橫說「怯懦浮薄之徒，動輒嘗歐米之遭糟粕，畏漢學如蛇蝎，此由不解漢學之為何物耳。後生其不惑而可矣」，批評崇洋人士。^[20]方豪並借題發揮，說「如今臺灣青年在光復四年有半矣」，一部分青年尚且「仍以日語為口頭禪，間並有不屑學習國語、國文者，連先生地下有知，更不知其將如何傷心！」認為臺灣青年作為中國人，應該體察連橫的在日本統治時期的民族意識，從擁抱國語開始。

在臺灣光復以後，隔年國民政府便在重慶重印《臺灣通史》。方豪說這是當時大陸讀者急於了解臺灣的一切，特別是歷史上「臺灣和大陸不可分」的這一部分。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位讀者。在〈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中，方豪提到自己閱讀連橫著作分成三期：在中國大陸時期初讀《臺灣通史》為第一期；來臺後讀連橫所編《臺灣詩薈》為第二期；在連震東處讀連橫手稿為第三

期。^[21]在這篇紀念性文字中，方豪稱連橫為「愛國史學家」。但方豪日後也坦言，實際上應該要大量史料才能寫就的《臺灣通史》，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連橫其實「無法進入總督府圖書館」，因此也無法完成有堅實史料基礎的通史。^[22]一方面也是因為連橫其實是一位詩人，曾是櫟社的成員，但實際上卻沒有史學的訓練，更接近文學家，而非嚴格定義下的史學家。因此，《臺灣通史》也許並不符合史料學派學者如方豪的史學標準，但不論連橫等文人的詩作還是史學作品，都至少反映著部分臺人對割臺乃至日本統治的痛心疾首，至少也是一部臺人的「心史」。連橫的通史充滿民族思想，甚至原有「獨立紀」一卷。但是當時連橫處在一個痛苦的時代，即使在付印之後，「獨立紀」被迫也改為「過渡紀」。^[23]此更動不能不說是一種出自無可奈何的屈辱。以此，方豪的臺灣史研究，不時地在為連橫等臺人之祖國、民族情懷發聲。為了補全《臺灣通史》部分之不足，方豪也曾出版〈《臺灣通史》藝文志訂誤述例〉，添入諸如伊能嘉矩（1867-1925）《台灣文化志》等史料之內容，作為補充。^[24]

肆、見證臺灣史研究「由盛轉衰」

按照方豪晚年回憶，他見證了臺灣史研究的「由全盛轉衰」，自己有幸趕上了民國37年（1948）這個關鍵年代：陳奇祿（1923-2014）主編《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第一期在5月出版、《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在10月出版。有待更多有心人加入，重振這個研究領域。何謂「由盛轉衰」？方豪認為有幾個層面：一是省、縣、市政府編制的精簡化，人事與經費都同步縮水，研究者的青黃不接；其二是以臺灣史研究為主題的期刊雜誌，如《臺灣文化》、《臺灣風土》、《臺灣研究》的停刊，使得臺灣研究與臺灣史研究開始走下坡。^[25]

方豪提到自己在許多研究臺灣的日本學者還未離臺的時期來到臺灣。他說是例如金關丈夫（1897-1983）、桑田六郎（1894-1987）、中村孝志（1910-1994）、國分直一（1908-2005）、富田芳郎（1895-1982）、宮本延人（1901-1987）、立石鐵臣（1905-1980）、池田敏雄（1916-1981）、西川滿（1908-1999）、神田喜一郎（1897-1984）等人都對臺灣史研究有所貢獻，他也得以在短時間和其中幾位（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立石鐵臣、宮本延人等人）交流。^[26]這些如今在臺灣史研究等領域如雷貫耳的日本學者，方豪當年便認為應該持平地去看待他們的業績；他們的研究動機和立場或可糾正，但成就不容抹煞。^[27]從和日本學者的交流和自己的探索，方豪發現了有大量俯拾即是題目可以研究，但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時間的發展，臺灣史研究者雖然持續研究，但發表的園地在數量上衰退甚多。

方豪提到的《民俗臺灣》為抗日戰爭末期主要的重要期刊，在抗日戰爭的末期，在《民俗臺灣》發表的作者群值得注意：戴炎輝（1908-1992）、楊雲萍、黃得時（1909-1999）、陳紹馨、石暘睢（1898-1964）、曹永和（1920-2014）、廖漢臣（1912-1980）、莊松林（1910-1974）、吳槐、郭水潭（1908-1995）、黃啟瑞（1910-1976）、連溫卿（1894-1957）、李騰嶽（1895-1975）、李獻章（1914-1999）、吳守禮（1909-2005）等人。^[28]《民俗臺灣》所收篇章多非長篇論文，而以短篇的風俗、掌故為

多，在1945年10月臺灣光復前7個月停刊。這些作者直到《民俗臺灣》停刊後許多仍筆耕不墜，成為如今認識日本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重要的參考資料。《民俗臺灣》期刊的內容反映了日本時期臺灣的一些風貌。

此外，方豪也認為臺灣史當時的研究風氣不佳。此或許也可作為他解釋臺灣史研究的衰象之註腳。其一是「同行必妒」，其二是「態度狂妄」，其三是「抄襲太多」。此觀察也許至少可以對應到所有歷史學領域，但因為身處臺灣，有關在地歷史的研究，就有更多冷暖自知但不吐不快的觀察。對於何謂「態度狂妄」，方豪並未多言，但他說「地域的觀念要放棄」。^[29]其一、其二可能是一體兩面，此「地域觀念」也許是臺灣島內不同地域間的地域主義，也可能是臺灣本身相對「祖國」的地域主義所形成的學者之狂妄心態，認為沒有在地的連結與關係，便沒有可能寫出令人信服的臺灣史。不過在方豪當時抒懷的時空，可能尚有不少不便多言之事，僅能點到為止。這場〈淺談臺灣史的研究〉的演講稿比另一場演講〈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較早一年，但都有批判日本學者臺灣史研究的短處及其深遠影響。來臺以後，方豪終其一生都在呼籲要留心日本學者的臺灣史研究，但也要小心日本學者的漢文解讀能力。因為不少不便指名道姓的學者們都因為翻譯照抄日本學者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研究，這便使得原先便屬錯誤的一手資料與二手研究一再影響日後的研究者乃至廣大讀者。^[30]方豪認為這種陋習對於主要以中文進行學術書寫的臺灣史研究者，就長遠來看，有不利的影響。

伍、歷史教育如何引起興趣

作為有代表性的史料派學者，方豪大量蒐集、勘訂、介紹史料，上課也全憑史料講述，並不過多發表自身見解。這種教學法不免使得他的教學變得「枯燥」，學生夢周公者亦不少。但方豪的教學方式，也可說是他對史料的研究方法與態度的展示。誠如許雪姬所言，方豪仍在「考訂、校勘史書」，指導論文時，也沒有一絲馬虎。^[31]當方豪在探討諸如歷來中國對臺灣和澎湖的「主權」這類饒富政治意味的題目時，也秉持著這種態度。以史料可能出版時間之先後以及內容之比較，說可以說的話，在方豪的許多這類文章中也是一以貫之。^[32]

方豪認為研究一種學問，「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興趣」是最重要的。在〈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中，方豪探討為何學生對本國史不感興趣，以及如何讓學生們感興趣。^[33]他認為「兒童沒有不愛聽故事的」。若是不愛的話，有幾種理由：要不是編寫得不有趣，要不是教得不夠生動。解決方案也很基本：其一，是沒有理想的教科書，而且教學考試都要求死記，無法引起興趣。方豪提到特別注意的一點，隨著需求不同，歐美任何一國都可以找到適合需要的本子。因為不同的篇幅長度，可以因應不同的課程需要，達到不同的教育效果。因此集合全國史學人才編寫合乎「各等人」需要的中國史，極其迫切；^[34]其二是沒有優良的高中教員。方豪提到有很多人選擇深造或留洋，因此教員上有些青黃不接，歷史系的畢業生多半出國，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或者被大學羅致去擔任講師。於是高中就沒有受過較多訓練的畢業生投入；其三是社會對理工太偏重，文學院只有外文系不是冷門。方

豪特別提到女性在此中的角色：因為女生比較細心，實則適合研究任何學問，但是因為功利心作祟，使得她們以爭取學分為主。如此就變得很依賴老師，很少能定下心來從事獨立研究。這對於需要潛心研究的歷史學，就是很大的考驗。^[35]

對於以透過歷史教育提升學生興趣，方豪提出五點建議：其一是培養民族觀念，強調「國世」（似為方豪首次提出），即「國家的身世」，激發學生的愛國心，以推進對歷史想要進一步認識的興趣。第二是將本國史編寫得更精簡。畢竟相較於美國史，中國史的歷史太長，令人望人生畏。為此，方豪且建議減少外國史材料，多出的篇幅和時間用以補充對本國史的認識。方豪的出發點，是因為西方（應該尤指美國）非歷史系的學生也普遍對外國史相當陌生，實則作為一個國民，也沒有必要認識更多。因此，方豪大膽主張初、高中的外國史，逕改為大學歷史系專攻西洋史學生的選修課，讓其他學生專心認識自己國家的「國世」即可。^[36]

第三是在歷史教課書中大量加入「插圖」。方豪認為大家應該坦白地面對自己在閱讀時，不論是報紙或者讀書，都是「看圖識字」，只要有圖，沒有不先看圖片的；且這也不因學齡或年紀而有差別。方豪舉例，說著名考古學者例如李濟（1896-1979）也大為讚賞研究北京人的法國學者Henri Breuil（1877-1961）以繪圖呈現想像中的史前人類生活，甚至將後者的著作翻譯後發表在《大陸雜誌》，以饗中文讀者。^[37]方豪認為以如此多殷商史的專家，殷商材料又遠多於北京人，如此尚無人繪成幾張圖片，是否是學者們僅將插圖當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方豪也說以自己研究宋史起家，《清明上河圖》也應該是要善用的圖片材料。「可惜出版商也無力加入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圖》」，就連出版較多的近代史著作也沒有圖文並茂。為此，方豪感到遺憾。第四，方豪鼓勵學生們多參觀博物館，且予以免費或降低門票票價。當時，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而無法實地赴中國本土旅遊，但從臺中遷入士林外雙溪中山博物館的故宮博物院，就收藏了大量的文物，可以讓學習歷史的學生們獲得觀賞實物的機會，也得以讓一般國民增強對數千年以來先民智慧與文化的尊重。以實物來激起參觀學生、民眾對過往榮光的嚮往。

最後，第五是加強「電化教育」，也就是善用媒體來推廣歷史教育。方豪以電影《西施》（1965年出品，由李翰祥執導）為例，提到若能以詳細的地圖來表現吳、越兩國的地理關係，以及其他疆界、軍事布陣圖、航程圖，電影的歷史教育價值則更大。^[38]方豪更進一步批判說電影若只顧到娛樂的目的，追求刺激的情節和場面，而沒有對人、事、物作任何考證，那就只是騙取觀眾荷包的钱，對歷史教育有害無益。若是更靠近方豪所主張的民族復興思想，例如可以呼應蔣介石（1887-1975）長年提倡「毋忘在莒」的「田單復國」主題，竟然沒有遲遲沒有製成電影，不知道電影製片廠的考慮為何。要而言之，方豪認為應該推陳出新，以電影加強歷史教育，廠商也可以獲利，是值得努力思考之事。^[39]

方豪也反覆思考「研究臺灣史的必要理由是什麼」。^[40]除了「國世」的追索之外，由故鄉家譜出發的「家世」之追尋，也是重要的起點。有關文獻，方豪說「文」就是文字，而「獻」就是耆舊，因此「口述歷史」也很重要。材料是無限的，但經常有時效性，例如書和檔案很容易因為保存狀況不佳而散失，耆舊則會凋零謝世。但要是理解到資料的無窮盡，「這些材料可以無限制增進我們的興趣」。^[41]方豪所言不虛，正是不斷發現的臺灣史材料，引起了方豪研究的興趣，使得他在臺灣史研究的業績與日俱進，

從史料上不斷發現有趣的課題，並觸類旁通，產生更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陸、結語

在方豪的論文行文中可能還沒有「公眾史學」這種觀念，但是方豪在寫作時，似乎都有這種意識。這種傾向在方豪收錄的雜文、演講稿中特別明顯，在在地顯示著方豪透過歷史研究推廣歷史教育的理想。方豪很早便說自己作為學者，擅長的是專題研究；但是他在生前似乎一直都構思於寫出一個整體的臺灣史。這個想法也許興起於方豪的晚年。對連橫《臺灣通史》的推重，也蘊含著方豪的民族史學的理想。方豪《臺灣民族運動小史》雖然是他的應酬之作，也是最早的嘗試。最接近所謂「新臺灣通史」此一計畫的《臺灣早期史綱》，是方豪在發表〈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後開始著筆的著作。方豪抱病寫作此書，沒能完稿就在1980年底與世長辭。這本書終於在1993年由方豪的學生們合力校刊完成，成為我們可以一窺方豪眼中的臺灣通史可能是何等面貌。毫不意外，《臺灣早期史綱》仍然有方豪史學的特色，即立基於史料，探討可疑的文獻，也以史料，甚至善用圖籍，釐清政治上敏感的問題。在方豪的視野中，史料也不是線性的，顯示的並不只是不斷的積累與進步，也不時有退步。歷代對臺灣的認識可以顯示史料的多樣特色。《臺灣早期史綱》有不少章節已經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等論文集，是一部經過時序梳理的臺灣新史。雖然僅止於清領時期以前，但已經足以讓讀者掌握方豪的臺灣史學研究之成果。

參考書目

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學術講演與專題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編，1976年，頁1-9。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方豪出版，1969年。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臺北：方豪出版，1969年。

方豪，《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臺北：方豪出版，1974年。

方豪，《臺灣民族運動小史》，臺北：正中書局，1951年。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

方豪著，李東華編，《方豪晚年論文輯》，臺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年。

李東華撰，關玲玲、楊宗霖編，《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洪健榮，〈開啟「典範」的先驅：方豪對清代臺灣方志的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26期（2011年3月），頁139-175。

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收入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頁223-232。

盧胡彬，〈方豪對臺灣方志研究的貢獻〉，《臺灣文獻》第61卷第1期（2010年3月），頁20-62。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方豪大部分的學術論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以及日後李東華（1951-2010）教授編著的《方豪晚年論文輯》等書，規模達數千頁，數百萬言。爾後，臺灣史的相關研究另收入方豪，《方豪教授臺灣史論文選集》（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讓研究者得以按圖索驥。

[2]《方豪年譜》、方豪研究，以及方豪著述列表都收入了李東華撰，關玲玲、楊宗霖編，《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3]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收入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頁223-232。

[4]盧胡彬，〈方豪對臺灣方志研究的貢獻〉，《臺灣文獻》第61卷第1期（2010年3月），頁20-62。

[5]洪健榮，〈開啟「典範」的先驅：方豪對清代臺灣方志的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26期（2011年3月），頁139-175。

[6]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臺灣早期史綱》，頁223-232。

[7]李東華撰，關玲玲、楊宗霖編，《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頁13-48。

[8]這10本書是：（1）連雅堂著，《臺灣通史》；（2）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3）余文儀纂修，《臺灣府志》；（4）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5）陳培桂纂修，《淡水廳志》；（6）黃叔瓚著，《臺灣使槎錄》；（7）江日昇著，《臺灣外記》；（8）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著，《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9）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著，《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10）里斯（Ludwig Riess）著，《福爾摩沙島史》。在方豪於1975年開設臺灣史課程以前，臺大主要的臺灣史教授是楊雲萍。

[9]方豪，〈臺灣文獻的散佚與今日的迫切工作〉，《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方豪出版，1969年），頁822-823。

[10]方豪，〈臺灣文獻的散佚與今日的迫切工作〉，《方豪六十自定稿》，頁820-834。特別是頁832-834。

[11]方豪，〈臺灣文獻的散佚與今日的迫切工作〉，《方豪六十自定稿》，頁822。

[12]方豪，〈臺灣文獻的散佚與今日的迫切工作〉，《方豪六十自定稿》，頁822。

[13]方豪，《臺灣民族運動小史》（臺北：正中書局，1951年）。

[14]方豪，《臺灣民族運動小史》，頁29。

[15]方豪，〈詩人筆下的臺灣淪陷〉，《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107-1125。

- [16]方豪，〈從「櫟社詩集」見臺灣詩人之民族精神〉，《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126-1128。
- [17]方豪，〈臺灣在政治上與文化上抗日的回顧〉，《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94-1110。
- [18]方豪，〈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55。
- [19]方豪，〈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55-1060。
- [20]方豪，〈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68。
- [21]方豪，〈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69-1073。
- [22]方豪，〈淺談臺灣史的研究〉，《方豪晚年論文輯》（臺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92。
- [23]方豪，〈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55。
- [24]方豪，〈《臺灣通史》藝文志訂誤述例〉，《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61-1065。
- [25]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學術講演與專題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編，1976年），頁6。
- [26]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學術講演與專題討論》，頁6。
- [27]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學術講演與專題討論》，頁4。
- [28]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學術講演與專題討論》，頁5。
- [29]方豪，〈淺談臺灣史的研究〉，《方豪晚年論文輯》，頁692。
- [30]例如方豪，〈日人著作中臺灣漢文文獻糾謬述例〉，《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094-1110。
- [31]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臺灣早期史綱》，頁230。
- [32]方豪，〈從歷史文獻看中國在臺澎的主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臺北：方豪出版，1974年），頁235-248。
- [33]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臺北：方豪出版，1969年），頁2554-2559。
- [34]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頁2554-2555。
- [35]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頁2555。
- [36]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頁2556。
- [37]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頁2556-2557。
- [38]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頁2558。
- [39]方豪，〈怎樣培養研讀本國史的興趣〉，《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頁2559。
- [40]方豪，〈淺談臺灣史的研究〉，《方豪晚年論文輯》，頁685。
- [41]方豪，〈淺談臺灣史的研究〉，《方豪晚年論文輯》，頁685。

知識流轉

臺灣地方志書寫與方豪治學理念

編輯者：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管理組

發行人：廖文宏

出版發行：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878

傳真：(02)2939-0455

電子書製作：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者：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91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02)2796-3638

傳真：(02)2796-1377

定價：新臺幣180元

初版日期：2023年10月

eISBN : 978-626-7147-35-1 (EPUB)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